

日本人家族的臺灣經驗： 以池ノ上嘉家族為例*

王麒銘**

摘 要

日治初期來到臺灣的日本人，或稍晚於日本統治上軌道後而來臺尋求發展的日本人，其第二代可能在臺灣出生成長；若該日本人家族直到 1945 年日本戰敗後才離開臺灣，則與臺灣的關係長達三、四十年以上。本文考察的池ノ上嘉家族正提供一個案例。

池ノ上嘉（1883-1946）於 1912 年來臺，任職臺灣總督府專賣局，1920 年辭職後進入大成火災海上保險株式會社，1940 年轉而參與開洋興業株式會社。池ノ上嘉從公職轉到公司經營，其活動的具體內容為何，本文首先探討其人脈關係及經濟實力。其次，池ノ上嘉的 4 子與 2 女之中有 5 人為「灣生」，均接受良好的教育，成為日後發展的重要憑藉。探討池ノ上家第二代的求學歷程，有助於豐富臺灣教育史的研究。再者，了解池ノ上家族的戰爭經驗，以及戰後從臺灣返回日本重新建立生活基礎的過程，更可以深化吾人對戰時下的臺灣，以及戰後臺日關係史的認識。

關鍵詞：池ノ上嘉、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大成火災、臺北高等學校

* 本文初稿發表於 2020 年 10 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之「日本帝國與殖民地：人流與跨境（四）國際學術研討會」，感謝與談人黃智慧教授提供寶貴的意見，以及審查人惠賜諸多修訂建議。筆者更要向池ノ上宏先生致上最深的謝意。儘管素未謀面，他細心地透過電子郵件回覆多項提問，使筆者對其家族史有深入的了解。撰寫期間得到鍾淑敏、蔡錦堂、津田勤子等師長的關心與協助，謹此申謝。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來稿日期：2021 年 11 月 15 日；通過刊登：2022 年 1 月 21 日。

- 一、前言
 - 二、從專賣局職員到成為會社高層
 - 三、池ノ上家第二代的教育歷程
 - 四、戰爭前後的池ノ上家
 - 五、結論
-

一、前言

本文考察池ノ上嘉(1883-1946, いけのうえ くわえ)及其家族的臺灣經驗,藉以探討攸關日治時期在臺日本人與教育史的課題。同時,透過本個案,分析有臺灣經驗的日本人,於二次大戰後如何維繫臺灣記憶及保持與臺灣的關係。

日治時期臺灣與日本同屬一國,國境內的往來頻繁。1895年以後前往臺灣的日本人,主要是任職於臺灣總督府(簡稱總督府)與其下各級官廳、教育機構及警察、軍事等相關單位者,以及來臺經商、就職、就學、依親等的日本人,凡此都是可能長期居住在臺灣者。來臺的日本人,有的理想滿懷,有的抱持投機一試的心態;其中,有人持續在臺灣尋求發展,亦有人面臨失敗而返回日本內地,甚至再前往海外他處謀生。此外,也有日本人為了視察、出差、觀光等目的而來到臺灣;到了戰爭時期,更有因軍事動員等緣故而來臺或途經本地者,不過這些屬於短期停留,並非以居留為目的。南進臺灣的日本人,或舉家遷臺,或之後再將家人接來,當然亦有許多人在此成家,日本人的家族史也是構成臺灣史的一部分。日治初期即來臺者,與日本統治更上軌道後而來到臺灣的日本人,其第二代有的在臺灣出生成長,若該家族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後才離開,則與臺灣的關係長達三、四十年以上。池ノ上嘉家族自1912至1946年在臺灣生活近四十年,親友圈中有不少臺灣關係者,是值得研究的對象。

向來有關日治時期在臺日本人的研究,概可分為個別人物研究與集體研究,

以下僅舉出學界的研究成果略作回顧，不包括有關「灣生」（在臺灣出生的日本人），以及一般書刊對在臺日本人個別家族史的介紹。個別人物研究方面，知名或中堅的總督府官僚、企業家、商人、銀行家、學者、教授及教師、技術專家、作家等，較受到青睞。此外，有研究者追尋日本女性在臺灣時期的身影，¹ 或針對在地方建設與發展上留下業績的日本人群像、² 在地方投資多項事業的日本人、³ 在基層執勤的警察⁴ 等加以考察，為她／他們的臺灣經驗定位。其中，能讓人聯想其家族者，厥為八田與一（1886-1942）；八田在水利工程等領域的業績，以及他去世之後家人的故事，每年在媒體與相關紀念活動中不斷被複述，成為當代臺、日兩國許多人的共同記憶。而在集體研究方面，臺灣各地的移民村、日本人社區，以及有共同背景日本人，例如日本國內某校畢業生與臺灣、某地出身者與臺灣等，亦是學者致力探討的課題。再者，以日本人在臺灣的關係網絡為主題，試著從親／姻緣、地緣、學緣、職／業緣等面向進行探討的研究，一方面梳理日本人來臺之前既有的淵源，同時釐清在臺灣衍生的新關係等，則提供另一個觀察角度。⁵ 要之，研究者基於各自的關心，開發多元的議題，重現日本人在臺灣的歷史，藉此可以深描臺灣近代史的多重面貌。⁶ 如上所述，儘管已有若干的研究關注在臺日本人，家族史的成果仍然不多，原因在於資料不易入手，以及如何由小見大，均是考驗研究者的難題。以下先介紹近年有關在臺日本人家族史研究的現況，接

¹ 這方面的成果參見吳佩珍，《真杉靜枝與殖民地臺灣》（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顏杏如，〈與帝國的脚步俱進：高橋鏡子的跨界、外地經驗與國家意識〉，《臺大歷史學報》（臺北）52（2013年12月），頁251-302；洪郁如，〈戰爭記憶與殖民地經驗：開原綠的臺灣日記〉，《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臺北）24（2014年12月），頁47-83。該文附上相關照片的日文版，收於洪郁如，《誰的日本時代：ジェンダー・階層・帝国の台湾史》（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2021），頁181-217。

² 王御風、吳孟青、杉森藍、許聖迪、黃于津，《和風吹撫的港市：打造高雄日人的故事》（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我已文創有限公司，2017）。

³ 吳玲青，〈殖民地臺灣熱帶園藝的地方實踐：增澤深治與二水「萬樹園」〉，收於關正宗編著，《佛教、歷史、留學：交流視角下的近代東亞和日本——柴田教授退休紀念文集》（新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1），頁383-397。

⁴ 郭婷玉，〈日常與監控：1910年代前期日籍警察與臺灣地方社會〉，《國史館館刊》（臺北）68（2021年6月），頁43-94。與該文同樣運用吉岡喜三郎（1882-1967）日記，考察1910年代後期吉岡在打狗支廳任職時的警察工作與生活之新近成果，詳閱陳凱雯，《港口、政策與人群移動：觀看近代臺灣史的微視角》（新北：采薈軒文創美學有限公司，2021），頁93-125。

⁵ 趙祐志，《日人在臺企業菁英的社會網絡（1895-1945）》（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3）。

⁶ 關於在臺日本人的研究回顧參見顏杏如，〈在台日本人：日本帝國下的人口移動と文化変容〉，收於若林正文、家永真幸編，《台灣研究入門》（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20），頁61-73。

著說明本研究的意義。

正如許雪姬對臺灣家族史方法論所指出的，研究者必須掌握私人資料及利用公家資料等加以印證。⁷此一原則亦適用於研究在臺日本人的家族史。近年來有研究生嘗試以此為課題，誠是可喜的現象。黑羽夏彥聚焦於出身山梨縣的秋山善一和秋山珩三兄弟，探討他們於日治初期來臺後的任職和經商活動，以及與本地基督徒的互動。⁸林祐里研究1920年代自沖繩移居臺灣的川平家族，娓娓道來川平家族在臺期間及1946年被遣返以後的故事。⁹詹雅晴描述來自沖繩的南風原朝保醫師在臺近三十年的生活，對其醫業與社團活動有清楚的說明，同時追蹤南風原家女性的生命軌跡。¹⁰田中美帆研究在臺北出生的竹內昭太郎(1927-2021)，分析竹內父親來臺就讀臺北高等商業學校、畢業後任職總督府專賣局，以及母親一家從島根縣遷居臺灣的緣由；接著分析竹內於日治末期就讀臺北高等學校(簡稱臺北高校或臺高，位在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內)時期的「學徒兵」經驗，以及戰後他擔任出入國管理局官僚時所接觸的臺灣人相關案件等。¹¹學位論文以外，尚有數篇佳作值得介紹。例如鄧慧恩詳述1895年隨軍來臺的木村謹吾醫師所從事的盲啞教育、其子木村高明接續投入的過程，更述及木村家被遣返回日本後的情形。¹²又如葉碧苓完成著名的記者和文藝愛好者尾崎秀真傳記，介紹其在臺長達45年的生涯，書中對他的2位夫人與4子2女(其中一女實際上是孫女)皆有所著墨，帶領讀者認識尾崎家族及其人際網絡。¹³上述個案的累積，有助於

⁷ 許雪姬，〈臺灣家族史研究及史料〉，收於張炎憲、陳美蓉、黎中光編，《臺灣史與臺灣史料(二)》(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1995)，頁215。

⁸ 黑羽夏彥，〈日治初期日本基督教徒在臺活動與人際關係之研究：秋山善一、秋山珩三兄弟為中心〉(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8)。

⁹ 林祐里，〈「灣生」川平朝清與其家族探討：臺灣、琉球與日本的邂逅〉(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有關川平家族，尤其是川平朝申(1908-1998)的研究，學界已累積數篇，於此不贅。

¹⁰ 詹雅晴，〈帝國邊陲的沖繩家族：南風原一家的移動與其時代〉(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¹¹ 田中美帆，〈移動與境界：臺北高校生·入管官僚竹內昭太郎的記憶分析〉(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1)。

¹² 鄧慧恩，〈木村家族與日治時期臺灣北部的盲啞教育〉，《臺灣風物》(臺北)69:1(2019年3月)，頁13-63。

¹³ 葉碧苓，〈全方位的文化人：尾崎秀真(1874-1949)研究〉(臺北：蕙風堂筆墨有限公司出版部，2020)，頁17-22。

建構日本人家族在臺灣的歷史，惟迄今從教育史的角度對在臺日本人家族進行探究者較為欠缺。本文有鑑於此，以池ノ上嘉家族為例，闡明日治中期臺灣建立較為完備的教育體系後，在臺日本人如何培育第二代接受高等教育，對家族的發展又帶來何種影響。

池ノ上嘉於 1912 年來臺任職於總督府專賣局，1920 年代辭職後進入大成火災海上保險株式會社（簡稱大成火災），曾任臺灣總支配人（支配人相當於經理，本文以下沿用日式名詞）；1940 年參與開洋興業株式會社（簡稱開洋興業），任監查役（相當於監察人）。就池ノ上嘉的經歷而言，屬於辭職後轉入商界發展者，在公部門與民間企業的人脈頗廣。有研究者利用 1910 至 1940 年代的人名錄，整理五百位辭職的在臺日本人官吏轉入臺灣商界發展的名單，並考察其人事特徵，惜該研究未將他列入名單中。¹⁴ 原因可能在於池ノ上嘉甚少出現在人名錄上，這似乎反映他是行事低調的人，而且綜觀日治時期臺灣的報紙和雜誌，也罕見他被採訪或主動發言登上版面。¹⁵ 媒體曝光度不高，也可以視為他是個性嚴謹的人，其處世作風令人聯想日治時期擅長品評人物的橋本白水所寫的短評。大成火災創立於 1920 年 1 月，是本社設在臺北的產物保險公司，¹⁶ 橋本在敘述該公司創立十週年時，指出該會社的營業佳績除了益子逞輔（1885-1979，茨城縣人）與板橋林家林熊光（1897-1971）等人的努力之外，池ノ上嘉功不可沒，將他列入「隠れたる功勞者」（幕後功勞者）。¹⁷ 對於這樣一位缺少資料的人物，幸而其孫池ノ上宏先生（ひろむ，以下敬稱省略）費心整理資料，更專程來臺調查蒐集文獻，終於為先人寫就一部傳記作品。¹⁸

¹⁴ 趙祐志，《日人在臺企業菁英的社會網絡（1895-1945）（下）》，頁 309-334。

¹⁵ 以學界常使用的「臺灣人物誌」資料庫為例，檢索結果僅 1 筆，出自谷元二編的《大眾人事錄》（東京：帝國秘密探偵社，1940 年第 13 版），內容記載其自家與大成火災的住址和電話、出生年與地點、興趣（讀書）。檢索自「臺灣人物誌」資料庫，下載日期：2020 年 10 月 1 日，網址：<http://tbmc.ncl.edu.tw:8080/whos2app/start.htm>。

¹⁶ 連克、曾耀鋒，〈經營理念與派別之爭：日治時期大成火災海上保險株式會社經營始末〉，《臺灣史研究》（臺北）23:3（2016 年 9 月），頁 43-84；連克，《從代理人到保險公司：臺灣商人的產物保險經營 1862-1947》（臺北：國史館、政大出版社，2017）。

¹⁷ 橋本白水，《臺灣統治と其功勞者》（臺北：南國出版協會，1930），頁 138。

¹⁸ 池ノ上宏，《台湾における日本統治の私的探求：「植民地台湾」に命を削った二人の祖父》（埼玉：池ノ上宏，2019）。〔按：以下引用簡稱《台湾における日本統治の私的探求》〕本書內容簡介可參見蔡慈蘋，〈《台湾における日本統治の私的探求：「植民地台湾」に命を削った二人の祖父》書介〉，

在此有必要簡介池ノ上宏的基本資訊。他的父親是池ノ上嘉的長男池ノ上容（おさむ，1910-2003），母親是池田幸甚（1880-1924，新潟縣人）與夫人池田鏡（舊姓稻葉）的四女池田正子（1918-1991）。正子畢業於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附屬高等女學校，與池ノ上容在東京相識、結婚（1938年，地點在學士會館）；池ノ上容於1939至1941年間任職於蒙古聯合自治政府（1939年成立，首都在張家口），在其下之大同都市建設局任職，接著到臺灣任職。池ノ上宏於1942年1月在臺北大正町出生，¹⁹ 日本戰敗時年僅4歲，1946年隨家人被遣返回日本。²⁰ 池ノ上宏雖然是「灣生」，但其臺灣經驗不到5年，他在書中也表示比起「灣生」的身分，戰後被遣返回日本、定居在東京都文京區大塚坂下町（外婆家，池ノ上容一家住在同地的別棟）的記憶，才是他的認同所在。²¹

池ノ上宏於退休後完成的書，聚焦於與臺灣有關的兩位祖父：池ノ上嘉與池田幸甚；前者在臺三十多年，於戰後離臺之後驟逝；後者在臺僅十餘年，在官僚生涯高峰時驟逝。池田的事蹟較為史學界所知，他於1907年自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翌年任職總督府，1914年11月任專賣局事務官，1921年10月擔任局長，1924年8月病逝於福岡九州帝國大學病院，享年45歲。根據鍾淑敏的研究，池田在專賣局任職不過數年，卻是總督府專賣史及對岸政策上的重要人物。²² 雖然池ノ上嘉與池田幸甚都在日本去世，正如《台湾における日本統治の私的探求》副標題所示，兩人的生平精華歲月在臺灣。池ノ上宏的書對了解池ノ上嘉與池田幸甚的生平極有助益，不僅介紹珍貴的史料，也提供家族故事，例如朱昭陽（1903-

《臺灣史料研究》（臺北）57（2021年6月），頁163-166。

¹⁹ 大正町的範圍約現今臺北市中山北路以東、新生北路以西、南京東路以南、市民大道以北，町內以日本人居民為主。有關該町的研究可參見津田勤子，〈日治時期臺北市大正町日人居民及其空間記憶〉，《臺北文獻（直字）》（臺北）216（2021年6月），頁155-194。

²⁰ 池ノ上宏1964年畢業於東京水產大學增殖學科，1966年畢業於千葉大學文理學部數學科，旋任東京水產大學助手，1970至1976年間在科威特國立科學研究所任研究員，1979至2007年間任株式會社國際水產技術開發的代表取締役（取締役相當於董事），辭職後至2012年任該社顧問，長年活躍於水產技術界等相關領域。參見池ノ上宏，〈台湾における日本統治の私的探求〉，版權頁。

²¹ 池ノ上宏回覆筆者的電子郵件（2021年6月、10月，簡稱「池ノ上宏信件」）。本文以下提及池ノ上家族的卒年，部分來自《台湾における日本統治の私的探求》內容及寫信請教而得，不另特別加註。津田勤子訪問、記錄，〈池ノ上宏（いけのうえ ひろむ）氏聞き取り〉（未刊稿），2019年6月21日於臺北市天津飯店。又，關於池ノ上嘉的孫輩，為尊重個人資訊，本文僅介紹池ノ上宏一人。

²² 鍾淑敏，〈殖民地官僚試論：以池田幸甚為例〉，《臺灣學研究》（新北）10（2010年12月），頁25-44。

2002) 成為池田家養子的過程，可與其他資料互證，深具參考價值。²³ 惟該書除前言與結語以外，五章中有四章與池田相關，即第二章「池田幸甚的生涯」、第三章「池田幸甚經歷的明治末期臺灣」、第四章「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時代池田幸甚的活動」、第五章「中國與池田幸甚」；僅第一章用來介紹「池ノ上嘉的生涯」。本文在此基礎之上，深入探討下列問題。

首先，池ノ上嘉為何來臺？他從公職轉到公司經營，其活動的具體內容為何？釐清這些問題為本文第一個目的。其次，他的4子與2女均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池ノ上嘉夫婦何以能栽培子女成材？描述第二代的求學歷程，有助於豐富臺灣教育史的研究，為本文第二個目的。到了戰爭時期，第二代有遠赴中國者，也有戰死在中國者，池ノ上家族的戰爭經驗為何，以及戰後「引揚」（意為離開某地，常指二次大戰後從海外返日）、在日本重新建立生活的過程，乃至戰後與臺灣的關係，則是本文嘗試探究的第三個問題。

本文利用總督府檔案、專賣局檔案、池田幸甚文書、同時代的出版品，以及池ノ上宏提供的資料，主要是家族關係圖、〈池ノ上嘉備忘錄〉（應為戰後被遣返前後所寫，直到去世前不久停筆）、照片等。²⁴ 此外，筆者也利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史組的臺北高校資料室之典藏，並參考相關研究進行論述，冀能適切地詮釋池ノ上嘉家族的臺灣經驗。

²³ 池ノ上宏，《台湾における日本統治の私的探求》，頁130。此事並非首聞，據廖史豪回憶，戰後初期在東京成立的臺灣同鄉會上，朱昭陽當選會長（也有別人當選之說），但有人批評朱「當日本官，做日本人池田之養子，如今豈能當會長」，於是由高天成（1904-1964）出任會長。參見張炎憲、胡慧玲、曾秋美採訪記錄，《臺灣獨立運動的先聲：臺灣共和國（上冊）》（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0），頁23。關於朱「做日本人池田之養子」的經緯，池ノ上宏的書披露其細節，但也只有簡短的敘述，即1938年9月朱成為池田幸甚夫人池田鏡的養子，旋即於12月分家，另立池田家。朱昭陽與家人改姓池田，例如其次子朱耀源（1937年在廣島出生）的日本名為池田光基。參見朱耀源，《漢堡·米漿·味噌湯：我的人生故事》（臺北：華漾出版社，2009），頁126。

²⁴ 〈池ノ上嘉備忘錄〉（池ノ上宏提供）有12頁（未編頁碼），為池ノ上嘉用鉛筆所寫，記載內容始於明治42年（1909）1月，但該年只記了1、5、9月總共數行而已；接著記載明治44年（1911），缺少有關大正時期的記載，昭和時期則從昭和7年（1932）開始，寫到昭和21年（1946）5月5日為止。每年的份量大抵只有數行，字跡不易辨識，內容大多為有關家人的動態。

二、從專賣局職員到成為會社高層

池ノ上嘉家族的臺灣經驗要從池ノ上嘉的來臺論起。本節首先敘述他來臺前的求學歷程，以及完成學業後的經歷，進而分析其任職專賣局期間的工作情形，以及辭去公職之後成為公司經營高層的經過。

(一) 求學任職與來臺經過

池ノ上嘉生於 1883 年 4 月，本籍為鹿兒島縣揖宿郡今和泉村，出生地為沖繩縣首里。父親名為池ノ上為義，於同年 1 月去世，享年 39 歲，池ノ上嘉為遺腹子。池ノ上家究竟是為義這代或更早即移住沖繩，並無資料可證。池ノ上嘉出生時，母親キセ（舊姓隈元，同樣出身今和泉村）在沖繩監獄工作，²⁵ 喪夫的她獨力撫養長男吉彥與次子嘉。附帶一提，池ノ上嘉幼名「為良」，後來改名為「加」，可能是中學畢業出社會後改名為「嘉」。²⁶ 在母親含辛茹苦的養育下，池ノ上嘉於 1900 年 4 月從沖繩縣中學校（今首里高等學校）畢業。²⁷ 該校創立於 1880 年，在草創期能念到畢業的學生極少，池ノ上嘉是第十二屆，有 26 位畢業生。²⁸ 在他畢業之前，1888 年第一屆以來的畢業生，每屆僅個位數或十餘人。他的同學有些人後來追求更高的學歷，也有幾位在百年校史中留名。²⁹ 這些同學長期在沖繩當地耕耘，或如東恩納寬惇（1882-1963，東京帝大史學科畢業的歷史學者）雖在

²⁵ 明治政府廢藩置縣以後，在沖繩強化警力，同時也建造新的監獄。本來監獄係暫時利用那霸港舊藩倉庫，此處空氣流通不佳，建物老朽，空間狹隘，故於 1882 年 6 月另外擇地建成新的監獄。參見我部政男，《明治国家と沖繩》（東京：三一書房，1979），頁 98-99。池ノ上嘉的母親應是在此新監獄工作。

²⁶ 池ノ上宏，《台湾における日本統治の私的探求》，頁 11、70。補充說明，池ノ上嘉的兄長吉彥於 1906 年去世，之後家督（一家之主）為其子吉勝；1928 年吉勝去世，家督改為吉勝的母親（フジヘ）；到了 1931 年，池ノ上家的戶主又改由池ノ上嘉擔任。

²⁷ 沖繩縣中學校原名首里中學校，其後改稱沖繩尋常中學校（1886）、沖繩縣尋常中學校（1887）、沖繩縣中學校（1899）、沖繩縣立中學校（1901）、沖繩縣立第一中學校（1911）。參見沖繩大百科事典刊行事務局編，《沖繩大百科事典（上卷）》（那霸：沖繩タイムス社，1983），頁 508-509；我部政男、宮城保編，《明治・大正・昭和沖繩縣學校寫真帖》（沖繩：那霸出版社，1987），頁 24。

²⁸ 〈彙報：本縣中學校第十二回卒業證書授與式〉，《琉球教育》（首里）52（1900 年 4 月），頁 66-67。

²⁹ 他們分別是嘉數弘榮（曾任沖繩師範學校教諭）、小嶺幸慶（1920 年代當選那霸市長）、崎濱秀主（曾任那霸市立商業學校長）、島袋慶福（歷任多所小學校長）、東恩納寬惇、與那霸政敏（曾任母校教諭）。參見首里高校創立百周年記念事業期成會編，《養秀百年》（那霸：該會，1980），頁 14-27。

東京任教，同時鑽研琉球與沖繩研究，³⁰ 相較之下，池ノ上嘉的人生則顯得曲折，臺灣才是他人生的重心所在。

池ノ上嘉從沖繩縣中學校畢業後，先在首里的尋常高等小學校任代用教員，但為求更好的發展，於是前往東京就讀東京郵便電信學校。³¹ 該校成立於 1871 年，原名修技教場，其後幾經改名，1890 年起稱東京郵便電信學校，位在芝公園內。³² 該校規定入學須年滿 18 歲，低於 25 歲，品行方正，並通過考試。³³ 學科分行政與技術兩科，前者主要教授郵便電信的監理，後者教授電信電話相關的學藝技術。修業年限 2 年，依規定畢業後有服務遞信省 5 年的義務。該校畢業生不必經過文官普通考試及事務練習，可直接被任用為從事郵便電信的判任官，但如欲擔任其他類的判任官，則須再經過考試。³⁴ 由此以言，該校招收已具備一定學識程度的學生，提供安定的學習環境，學生畢業後可進入遞信省工作。換言之，在保證就業的條件下，學生不必擔心前途，此種制度對養成國家所需的人才而言頗能發揮效用。池ノ上嘉就讀時，該校已成立約三十年，校方彙整統計畢業生已達 2,257 人，出路最多是電信（1,714 人），其次是郵便（161 人）。³⁵

池ノ上嘉於 1903 年 3 月自東京郵便電信學校行政科畢業後，先在東京的通信管理局工作半年，10 月轉到鹿兒島郵便局上班，可能此時開始與母親一起生活（キセ辭去監獄工作的時間不詳），至於已結婚的兄長一家則住在沖繩。日俄戰爭期間，他進入軍隊約一年（配屬步兵第二十三聯隊，在熊本，未前往戰地），期滿離開軍隊後，1906 年 2 月回歸鹿兒島郵便局，任職至 1908 年 6 月，7 月以後改到奄美大島的名瀨郵便局工作。1909 年 1 月，經人介紹而與鹿兒島市山之口町出身的前田ヨシ（1888-1968）相親，1910 年 1 月結婚，12 月池ノ上嘉夫婦迎接長男池ノ上容的誕生。1911 年 3 月他的工作地點轉到八幡郵便局，7 月再轉往熊本遞信管理局任職。儘管不斷調動單位，基本上仍在九州地區任職。³⁶ 晉升為人父

³⁰ 日本歴史学会編，《日本史研究者辞典》（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頁 270。

³¹ 池ノ上宏，《台湾における日本統治の私的探求》，頁 12、71。

³² 東京郵便電信學校編，《東京郵便電信學校一覽》（東京：該校，1893），頁 1-52。

³³ 東京郵便電信學校編，《東京郵便電信學校一覽》（東京：該校，1903），頁 46-48。

³⁴ 東京郵便電信學校編，《東京郵便電信學校一覽》（1903），頁 43-45、48-49。

³⁵ 東京郵便電信學校編，《東京郵便電信學校一覽》（1903），頁 140。

³⁶ 池ノ上宏，《台湾における日本統治の私的探求》，頁 12-13、71。

後，他所承擔的責任更加重大，在這種情形下，1912年其人生有了大方向的轉變。

年近三十的池ノ上嘉何以選擇南進臺灣？關於他的動機，可考慮的論點包括：第一，地緣關係，亦即鹿兒島縣出身者在臺已有相當人數。第二，學緣關係，亦即沖繩縣立中學校或東京郵便電信學校關係者的提攜，但他來臺後並非任職郵政方面工作，故後者的因素可不予考慮。第三，人脈關係，亦即專賣局中有他熟識的人。此外，在臺灣有外地加給，待遇的提升無疑也是渡臺者的考量要因。

首就地緣關係而言，九州地區與沖繩有許多人遠赴海外，風氣頗盛。³⁷ 臺灣成為日本版圖以後，上述兩地出身者占在臺日本人的最多數；鹿兒島縣人約1910年代以後位居多數。丸山芳登（曾任臺北醫學專門學校教授、總督府技師）計算人口統計資料後指出，1905年在臺的日本人，本籍為東京、大阪者居多（未指出具體數字），到了1930年以後，九州、中國地方（鳥取、島根、岡山、廣島、山口等縣）出身者居多，最多的是鹿兒島，熊本次之，第三名是福岡，最少的則是青森縣。³⁸ 有關鹿兒島縣人在臺灣的活動情形，目前僅見1933年發行的《高雄州下鹿兒島縣人芳名錄》，編輯兼發行人為關豬之助，他有意編纂臺灣鹿兒島縣人芳名錄，首先完成高雄州的部分，全臺的同鄉名錄似未見問世。³⁹ 雖無全面性的同鄉錄可用，根據王麗蕉利用「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簡稱職員錄系統）所做分析發現，日治時期臺灣的日本人公職人力中，人數最多的前三名是鹿兒島、熊本、福岡，前十名中九州地區上榜的尚有佐賀、大分、長崎；若將對象集中在初等教育機關任職者，超過三千人次的府縣依序是鹿兒島、熊本、福岡、佐賀、大分、宮崎、沖繩，都來自九州。⁴⁰ 而在渡臺的眾多鹿兒島縣人之中，池ノ上嘉的長輩有幾位於日治初期即有臺灣經驗，分別是舅舅隈元禎三、⁴¹ 姨丈脇田靜吾

³⁷ 有關鹿兒島縣人前往海外的研究，可參見原口邦紘，〈移民研究と史料：鹿兒島県の場合〉，《JICA 横浜海外移住資料館研究紀要》（横浜）4（2010年3月），頁39-52。而對沖繩人為何前往海外的說明，新近的論著可參見松田ヒロ子，〈沖繩の植民地の近代：台湾へ渡った人びとの帝国主義的キャリア〉（京都：世界思想社，2021），頁31-67。

³⁸ 丸山芳登編，《日本領時代に遭した台湾の医事衛生業績》（横浜：丸山芳登，1957），頁19-20。

³⁹ 關豬之助編纂，《高雄州下鹿兒島縣人芳名錄》（高雄：鹿兒島縣人芳名錄發行事務所，1933）。

⁴⁰ 王麗蕉，〈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在人文研究之應用：以日治臺灣初等學校教師及其跨境為中心〉，《臺灣史研究》27: 3（2020年9月），頁167-212。

⁴¹ 隈元禎三1895年10月渡臺，從代理警部做起，曾任臺南縣辦務署長等職，1900年3月被命休職。參見「元臺南縣弁務署長隈元禎三恩給」（1901年12月1日），〈明治三十五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十三卷恩賞〉，《臺灣總督府檔案》（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0725001。

(キセ妹妹ナツ的先生)、⁴² 姨丈永井德照(キセ妹妹トクの先生, 長年在臺)。⁴³ 地緣關係對他思考未來的方向產生作用, 有極高的可能性。

次就學緣關係而言, 根據沖繩縣立圖書館典藏的《沖繩縣立第一中學校同窓會報》(1923年),⁴⁴ 進而檢視總督府檔案等資料可知, 至1910年第二十二屆為止該校畢業生與臺灣有關者約六十人。早期畢業生中任職總督府者, 依畢業屆次包括石原榮輔(第二屆)、⁴⁵ 伊地柴本(第三屆)、⁴⁶ 若山忠治郎(第三屆)、⁴⁷ 奧川鐘太郎(第六屆)、⁴⁸ 小橋川朝松(第八屆)、⁴⁹ 田中豐彥(第十屆)、⁵⁰ 野原春太郎(第十屆)、⁵¹ 東恩納盛亮(第十屆)⁵² 等人。此外, 曾就讀該校第八

為避免繁瑣, 本節引用總督府檔案時, 部分僅顯示典藏號。有關隈元禎三的生涯, 另可參見池ノ上宏、徳田順作, 《日本統治下の台湾に渡った今和泉村の村びと》(埼玉: 池ノ上宏; 指宿: 徳田順作, 2022), 頁129-156。

⁴² 脇田靜吾 1896年5月任臺中縣看守長, 翌年5月任埔里社監獄署長、看守長時被命非職(不任現職之意), 其後以生病為由請辭, 1900年2月獲准(00009392059、00009401080)。

⁴³ 永井德照 1896年5月從臺北縣巡查做起, 歷任新竹縣警部等職, 1901年6月任專賣局書記, 1904年3月轉任大藏省神戶棹腦事務局; 1906年退休後經商, 至1940年前後概有以下頭銜: 永照堂主(藥品等之批發商, 後改名為永井裕商會)、臺北鐵道取締役、東洋木材取締役、臺灣勸業無盡取締役、大正醬油監査役、大正醬油取締役、日東礦業社長、薩南木材社長; 1946年離臺, 1951年去世。參見00009398036、00112577003; 內藤素生編纂, 《南國之人士》(臺北: 臺灣人物社, 1922), 頁48-49; 太田肥洲編, 《新臺灣を支配する人物と産業史》(臺北: 臺灣評論社, 1940), 頁631; 谷サカヨ, 《大眾人事錄: 外地・滿・支・海外篇》(東京: 帝國秘密探偵社, 1943年第14版), 頁50; 〈永井家、隈元家、園田家、池ノ上家、岩崎家關係圖〉(池ノ上宏提供)。

⁴⁴ 筆者雖然未實際翻閱該資料, 但在網路上可見有人整理會報中的早期畢業生名單, 內容包括第一屆至1910年第二十二屆。第一到十八屆參見〈1923年2月 沖繩縣立第一中學校同窓会『同窓会報 第一号』①〉, 下載日期: 2021年6月4日, 網址: <http://ryubun21.net/index.php?itemid=5681>; 第十九到二十二屆參見〈1923年2月 沖繩縣立第一中學校同窓会『同窓会報 第一号』②〉, 下載日期: 2021年6月4日, 網址: <http://ryubun21.net/index.php?itemid=5936>。

⁴⁵ 石原榮輔 1896年受僱於臺北監獄署, 翌年任臺北縣監獄書記, 其後擔任縣辦務署主記, 1905年底在深坑廳屬任內辭職(00001133031、00009262040)。

⁴⁶ 伊地柴本 1898至1903年任土地調查雇員、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技手(00000343056、00004352003)。

⁴⁷ 若山忠治郎 1896至1907年任國語學校乙種講習員、民政局屬、府屬(00000198010、00001273016)。

⁴⁸ 奧川鐘太郎 1905年起任府屬數年, 後為菸草專賣指定經銷人, 亦曾任新竹州協議會員, 日治末期仍在臺。參見00001124041; 「奧川鐘太郎等人退職名簿」(1945年1月1日), 〈南日本鹽業株式會社退職者名簿〉, 《臺灣鹽業》(南投: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典藏號: 006-340002-013; 〈煙草賣捌人指定〉, 《府報》第721號(1915年4月1日), 頁3-4; 「職員錄系統」查詢結果。

⁴⁹ 小橋川朝松 1899年任府屬, 從事地方警務至1905年, 1907至1919年任職樺太廳, 1921至1933年任職總督府專賣局(00000452019、00112475063、00112610028)。

⁵⁰ 田中豐彥 1900年起短暫任臺南郵便電信局建築課臨時雇員、臺北監獄醫務所臨時雇員、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雇員, 翌年因「品行不善, 勤務成績不良」被解僱(00004323012、00004332124)。

⁵¹ 野原春太郎 1902至1903年任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技手(00004335028、00004352016)。

⁵² 東恩納盛亮 1900年從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 留校任教諭後, 任教多間公學校; 1913年因病辭職, 但

屆的照屋宏（1875-1939），因故退學，其後就讀第一高等學校、京都帝國大學工學部，1903年大學畢業後任職總督府鐵道部，比池ノ上嘉來臺早約十年。⁵³ 上述幾位是池ノ上嘉的學長，就他們的經歷觀察，大多於日治初期來臺，基本上是低層職員或教員，任職民間者僅少數。而同屆畢業的山田朝常則略晚來臺，任職總督府官房統計課。⁵⁴ 低他一屆的學弟則有6人來臺，包括名嘉山安忠（1882-1939，詳後）、大山辰二、⁵⁵ 城間宏惠、⁵⁶ 照屋久八、⁵⁷ 勝屋米雄、⁵⁸ 山城正鳴。⁵⁹ 中學校友與池ノ上嘉的來臺雖無直接相關，他們在日本對臺灣的統治還未上軌道的時代渡臺，反映臺灣確實是沖繩地區人士的出路。

如上所述，由地緣關係及時代潮流的角度理解池ノ上嘉願意南進臺灣較為合理。而居中為他牽線的人，應是姨丈永井德照。永井曾在臺灣擔任警部、專賣局書記等職，1906年後長年經商。從檔案可以確知，1912年3月下旬，永井從鹿兒島發電報到增澤有專賣局長官邸，表示擬讓池ノ上嘉搭4月初的船隻渡臺，但專賣局見他尚未來臺，局長乃發電報給永井，詢問是否已出發，若尚未動身則請轉達其儘速啟程。池ノ上嘉於4月8日從熊本出發，12日抵臺。⁶⁰ 由檔案中的

半年後又回臺任教；1925年臺灣教育會表彰為教育功勞者；1927年因病辭職；1935年合祀於芝山巖。參見00000571022、00002200035、00002315008、00010215020；〈二月一日芝山巖に 合祀さるる人々〉，《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1月31日，第7版。

⁵³ 照屋宏任官至技師，1929年辭職，後曾當選那霸市長。關於其事蹟可參見又吉盛清，《大日本帝国植民地下の琉球沖繩と台湾：これからの東アジアを平和的に生きる道》（東京：同時代社，2018），頁235-249。

⁵⁴ 山田朝常1914年來臺前為那霸港務所書記，同年進入總督府官房統計課；該課於1918年改為調查課，山田從雇成為府屬（00002888064X002）。

⁵⁵ 大山辰二1906年從長崎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其後來臺，名嘉山安忠開業時採用為醫員（00005264012）。

⁵⁶ 城間宏惠1907年從長崎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翌年1月任臺北醫院醫務囑託至1910年9月，接著在臺北開業至1911年3月，4至11月受殖產局囑託，服務於吉野村移民指導所。後任職於基隆醫院，1913年9月辭職，再服務於花蓮港廳。1915年回沖繩行醫，1918年底任總督府醫院醫官補，服務於澎湖醫院；1920年8月被免官。參見00001885025、00001894029、00002197067、00002895085；〈敘任及辭令〉，《府報》第2191號（1920年8月29日），頁100。

⁵⁷ 照屋久八1903年從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任教公學校至1920年代（00000874025、00002311018、職員錄系統）。

⁵⁸ 勝屋米雄1901年7月起任職於總督府，先後在通信局、遞信局任職，1923年1月離職（00003462014X001、00010329002）。

⁵⁹ 山城正鳴1905年從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任教各公學校至1920年代（00001094016、職員錄系統）。

⁶⁰ 「遞信管理局書記池ノ上嘉任書記」，〈明治四十五年自一月至七月人事書類（專賣局）〔3〕〉，《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公文類纂》，識別號：TMB_13_07_078，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下載日期：2020年10月4日，網址：<http://tais.ith.sinica.edu.tw>。

短短數語可推知，池ノ上嘉曾向姨丈請益、獲得鼓勵，以及永井為外甥的轉職盡力幫忙。

來臺前的池ノ上嘉有穩定的工作，雖稱不上中產，一家三代應可過著安穩的日子，然而他志不在此，盼能在新天地有所作為。他出身日本列島最南端的鹿兒島，中學時期又在沖繩度過，這兩地渡臺的人數頗多，且親戚、中學學長等人都有幾位於日治初期赴臺，置身在這樣的環境裡，不難想像對他思考生涯規劃產生影響。

（二）轉職與成為會社高層

池ノ上嘉來臺時，當時專賣局的編制包括局長 1 人（山脇春樹）、事務官 6 人、技師 5 人、翻譯官 1 人、書記 84 人、技手 36 人、通譯 6 人，合計 139 人，並得於經費內追加技師及技手；局內分成庶務課、製造課、腦務課、鹽務課、煙草課。庶務課長是煙草課長高雄晉兼任，該課執掌的事務有兩項：第一，職員進退、機密、統計及其他非他課所管事項；第二，會計及各種收入相關事項。池ノ上嘉擔任庶務課書記（共 16 人），職責是秉承上官指揮、從事庶務會計。根據每年出版的總督府職員錄，書記、技手及通譯的人數雖略有變動，但專賣局通常仍維持約 130 人的規模。⁶¹ 1914 年 6 月，局長從山脇換成賀來佐賀太郎，11 月池田幸甚被任命為該局事務官，庶務課長從高雄晉換成池田，於此池田與池ノ上成為上司與下屬的關係。從池田的手記可知，池ノ上嘉曾被派到專賣局在各地的支局檢查帳簿和金櫃，以及查定要給小職工（小使）等的年末賞與金，也曾夜訪池田討論庶務課員借款整理相關事宜。⁶²

池ノ上嘉任職專賣局期間，公餘在家時勤於讀書、充實自我，然因子女陸續出生，分身乏術，無法達成更上一層樓的目標，終究未能實現透過公職考試晉升的夢想，但這並非徒勞無功，無形中讓他累積學力和見識。⁶³ 此一時期還值得注

⁶¹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13），頁 95-96；《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1914），頁 101-102；《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1915），頁 100-101；《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1916），頁 103-104；《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1917），頁 106-107；《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1918），頁 109-110；《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1919），頁 123-124。

⁶² 池ノ上宏，《台湾における日本統治の私的探求》，頁 14。

⁶³ 池ノ上宏，《台湾における日本統治の私的探求》，頁 72。

意的是，他曾學習新的外語。一次大戰期間日本興起南進熱潮，為從事南洋的調查研究及開發，政界與實業界的要人發起成立團體，於1915年1月成立南洋協會。南洋協會有鑑於日本人前往南洋發展須先學會相關語言，於是開辦荷蘭語與馬來語講習會。該會的臺灣支部亦推廣外國語的學習（馬來語、法語等）。以馬來語講習會而言，1916年10月舉辦第一回，聘請東京外國語學校馬來語科出身的上原訓藏擔任講師，第三回以後則由總督府工業學校教諭越智有擔任。⁶⁴ 池ノ上嘉參加的第一回，有15位日本人與2位臺灣人修畢；在3個月的講習期間，每週上課3次，每次2小時，學費3圓。⁶⁵ 經過密集的上課，12月舉行結業式，支部幹事東鄉實代替支部長下村宏（總督府民政長官）對結業生授予證書，講習生則由池ノ上嘉代表發言。⁶⁶ 學習馬來語與池ノ上嘉的業務似無直接相關，惟由此一例可見他努力吸收新知，這種積極進取的精神應會被人肯定，而以身作則的向學心，對子女當有耳濡目染的作用。

在賀來局長與池田課長之下，池ノ上嘉始終擔任書記，直到1920年辦理離職。在總督府檔案中涉及「恩給」（退休金）的資料被列為永久保存，池ノ上嘉的離職與領取恩給之經過，可歸納如下：1920年4月，池ノ上嘉以生病不堪負荷職務為由提出辭呈，並附上名嘉山安忠開立的診斷證明；醫師指出罹患腳氣病的原因雖然不詳，病因出在身心過勞和「濕潤的土地」，建議辭職以便靜養及接受治療，待病情稍有好轉後改住到「高燥溫和」的地方調養身體。池ノ上嘉因任公職滿15年以上，可依規定申請恩給，同年7月向總督府提出恩給請求書（包括履歷書、醫師診斷書、戶籍謄本），由賀來局長上呈總督。同年8月，總督府以該案經查符合官吏恩給法第二條，再經照會陸軍省人事局恩賞課，確認他曾任志願兵，在內地服戰役相關勤務，陸軍省認定為有功勞者。於是總督向內閣總理大臣上申本案，相關資料於8月底送達內閣恩給局，惟翌月該局回覆總督府官房表示計算

⁶⁴ 堀口昌雄編，《南洋協會十年史》（東京：南洋協會，1925），頁113-114、220-228。

⁶⁵ 橫井香織，《帝國日本のアジア認識：統治下台湾における調査と人材育成》（東京：岩田書院，2018），頁80-83。據該書統計，南洋協會臺灣支部舉辦的馬來語講習會，自1916年10月至1924年6月共11期，累計224名講習生修畢。

⁶⁶ 〈馬來語卒業式〉，《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12月10日，第2版。目前可見結業時的合照，惜未附上名字。參見《臺灣日日寫真畫報》（臺北）第1年第7號（1917年1月），頁9。

有誤，故重新調整恩給金額。⁶⁷ 同年 12 月，總督府將恩給證書送至臺北州廳，由該廳轉交住在臺北市的池ノ上嘉。⁶⁸ 這些經過層層計算而得出的金額數字，反映近代日本的行政制度對離職者所能領走的恩給，做到精算的程度。

上文提及為池ノ上嘉開診斷證明的醫師是名嘉山安忠，兩人為舊識。名嘉山於 1901 年從沖繩縣立中學校畢業，1905 年從長崎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先到東京的鈴木胃腸病院任醫員，1907 年 6 月辭職，不久後來臺任職於臺北醫院小兒科，身分為醫務囑託（相當於約聘人員），協助稻垣長次郎從事腳氣病相關研究；12 月向總督府申請醫業免許證（許可證書），旋獲同意。1908 年 4 月任臺北醫院病棟主任，10 月解除該院的囑託，12 月開業，專門是小兒科；1910 年 7 月開設醫院。⁶⁹ 名嘉山逐漸累積聲望，在社會活動方面曾擔任各家會社與各校的醫師，以及臺北的沖繩縣人會會長（前任為照屋宏）。⁷⁰ 池ノ上嘉回憶，名嘉山是中學晚一屆的學弟，雖無同窗情誼，但認識之後友情加深，1901 年在沖繩分別後，彼此即沒有交集，在臺北才又重逢。池ノ上嘉認為名嘉山為人聰明，個性溫和，極易相處，故全家的健康都交由他照顧，「多年以來沒有人生過大病而需要住院。」⁷¹ 他鄉遇故知以後，雙方家庭的交往頗深。1920 年時的池ノ上嘉正值壯年，以腳氣病為由辭職。約 1910 年代以前，不少日本醫師認為此病乃細菌傳染所致，常指示患者

⁶⁷ 原先根據總督府的計算，池ノ上嘉自任遞信省通信書記以來，曾任志願兵 1 年，到他來臺任職以前，在遞信省工作 8 年；任職總督府的時間為 8 年又 10 天，臺灣在勤時間經過加算共計 21 年；其退官時的年薪為 720 圓，換算後，其恩給金額為 198 圓，每年分 4 次發放。經恩給局重新計算，改為每年 215 圓。

⁶⁸ 「恩給證書下付（池ノ上嘉）」（00003010013）。

⁶⁹ 名嘉山的學經歷等資訊，綜合自以下資料：「【名】嘉山安志【忠】醫業免許證下附ノ件」（00001372001）；「私立病院開設報告ノ件（臺北廳）」（00005264012）；成瀬麟、土屋周太郎編，《大日本人物誌》（東京：八紘社，1913），頁 48（な之部）；名嘉山徹，〈名嘉山安忠年譜〉，收於平井二郎編，《名嘉山安忠歌集》（臺北：あらたま發行所，1940），頁 135-140。本書由名嘉山夫人トミ（也寫成富子，鹿兒島縣人，舊姓前田）贈送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現典藏於國立臺灣圖書館。附帶一提，由書中內容可知，名嘉山的長女嘉子之夫婿為島內滿男（時任臺北帝大附屬農林專門部講師），後來是頗有成績的農業專家；嘉子與島內於 1933 年 1 月結婚，數日後名嘉山的次女幸子去世。

⁷⁰ 與儀清，《臺灣の寶庫と沖繩縣》（那霸：與儀清，1932），頁 16、78、116-117。

⁷¹ 兩人的友誼因名嘉山早逝而中斷。1939 年 3 月，名嘉山臥病僅一週即去世（同月其長男從京都帝大畢業）。29 日《臺灣日日新報》刊登其訃聞，親友代表 7 人之一為池ノ上嘉。30 日葬禮在樺山町淨土宗別院（今善導寺）舉行。參見上引〈名嘉山安忠年譜〉，頁 140；池ノ上不鳴，〈名嘉山安忠君の追憶〉，《あらたま》（臺北）18:9（1939 年 9 月），頁 22-24。由內容判斷池ノ上不鳴即池ノ上嘉，不鳴當為其筆名。

轉地療養；然而隨著 1910 年代科學知識進展，醫界逐漸了解改善飲食、攝取維生素 B1 才是解決之道。⁷² 名嘉山面對腳氣病，仍建議患者轉地療養，或與其學術見解有關。照理說池ノ上嘉應無需轉地療養，事實上他並未遵照醫囑，而是轉換跑道進入公司任職。雖無證據顯示，恐也極難證明診斷書係名嘉山出於好意協助而開立，但不排除有這種可能性。如上所述，池ノ上嘉後來感謝由於名嘉山的照顧，全家人都維持健康，若曾因病而兩度辭職（後述），則沒有不寫下來的道理。在現存的總督府檔案中，與辭職有關的人事資料中常可見此類證明書，其真實性存疑，實不宜逕自視之為離職的真正原因。

1920 年 5 月，池ノ上嘉在益子逞輔的提攜下成為大成火災的社員。⁷³ 他後來受訪時表示，最初並不認識益子，受到賞識應是益子與池田幸甚為舊識之故。⁷⁴ 益子的基本學經歷簡介如下：1908 年從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畢業，經入伍後，1911 年起擔任臺灣日日新報社記者，至 1916 年 6 月退社，同年底受專賣局委託關於專賣調查事務，翌年 4 月解除囑託。⁷⁵ 益子為專賣局做事，可能與池田有所接觸，間接認識池ノ上嘉，看中他的能力而加以延攬。即使池ノ上嘉已離開專賣局，從池田的資料可知，1921 年 11 月益子拜訪池田並討論池ノ上嘉的事，惟談話內容不詳。⁷⁶ 此一時間點頗耐人尋味。蓋同年 7 月賀來佐賀太郎擔任總務長官，專賣局高層人事發生變化，10 月池田接任局長。考慮到日後池ノ上嘉在池田的要求下回局任職，或許池田此時即希望他回來輔佐。

1923 年 4 月，池ノ上嘉再回專賣局庶務課任職，仍擔任書記。此一時期專賣局的規模較 1910 年代倍增有餘，反映該局業務的擴張。⁷⁷ 同年 6 月，身體狀態不佳的池田幸甚被命出差日本國內，用意在於讓他到東京帝大附屬病院接受治

⁷² 范燕秋，〈日治時期臺灣公共衛生與飲食營養：以營養缺乏症「腳氣病」為中心〉，收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整理組編輯，《第九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7），頁 401-432。

⁷³ 池ノ上宏，〈台湾における日本統治の私的探求〉，頁 15。

⁷⁴ 〈支配人訪問記〉，《臺灣實業界》（臺北）第 1 年第 8 號（1927 年 11 月），頁 22。

⁷⁵ 「益子逞輔」（1917 年 1 月 1 日），〈大正六年元在官職者履歷書專賣局〉，《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112592023。

⁷⁶ 原文為：「益子君來訪池ノ上君身上二付相談。」又，另有一處（時間無法確定）寫著：「益子君來訪池ノ上氏身上二干スル件談合。」參見《池田幸甚文書》（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識別號：IKE_02。

⁷⁷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1923），頁 128-129。

療，隨行者有池ノ上嘉等 3 人。7 月初池田夫人覬帶著 5 名女兒上京，直到 8 月中旬池田夫人一行由專賣局書記出澤鬼久太陪同返臺。⁷⁸ 8 月 31 日，池田獨自前往平塚（位在東京附近的神奈川縣）的友人家中，翌日發生關東大地震，其友人家在不到 20 秒內倒塌，池田逃過一劫，隨身物品仍完好，然因交通不便，9 月 14 日才能搭貨車回東京，之前放在旅館內的物品除了鞋帽以外，幸因平田未治（詳後）的搶救而得安然無事。19 日池田、池ノ上及平田從東京出發，22 日自神戶搭船返臺。同年底，池田被命休職，病情加劇後又再往福岡就診，家人也隨之離臺。1924 年 6 月，池ノ上嘉寫信給池田夫人，報告經援池田家的計畫，亦即賀來長官、三村三平（前總督府官員，時任臺灣製腦會社專務取締役）、藤野幹（前總督府官員，時任明治製糖專務）、益子逞輔、鎌田正威（專賣局事務官）、花香伯貢（專賣局腦務監督官）、村上勝太（專賣局囑託）、出澤鬼久太、池ノ上嘉等人每月出資匯款；出澤書記也寫信報告池田太太，7 月以後每月將匯 400 圓給池田家。8 月池田病逝於福岡，池田夫人與子女在福岡待到 10 月，期間村上寫信表示三村與賀來長官已談妥要募集教育資金，金額約在 1.5 至 2 萬圓。不久後池田夫人與子女轉往東京生活，池田家與臺灣的關係日漸疏離。⁷⁹ 由上可見專賣局人員在池田幸甚過世前後，對池田及其家屬給予許多幫助，池ノ上嘉也基於感念長官而熱心協助。

重回專賣局的池ノ上嘉並未長期任職，1924 年 4 月又以疾病不堪職務為由辭職，再度請求恩給。這次又由名嘉山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書，說明池ノ上嘉經過充分療養後，1923 年已近乎痊癒，不料 1924 年 4 月工作時突感「心悸亢進，胸內苦悶」，急需施以治療，故建議有必要離職，轉往氣候溫和之地養病。其辭職相關資料經總督府查核後，符合恩給法之規定，於是向內閣恩給局上申。這次加上 1923 年 4 月到翌年 4 月的年資，累計達 22 年又 1 個月。他辭職時的年俸為 1,620 圓，經過計算，普通恩給可領 616 圓，每年分 4 次發放，即每期 154 圓。⁸⁰ 池ノ

⁷⁸ 池ノ上宏，《台湾における日本統治の私的探求》，頁 106-114。

⁷⁹ 池ノ上宏，《台湾における日本統治の私的探求》，頁 115-129。池ノ上嘉信中提及的「花香」，本書註為「花香壽」，應為花香伯貢之誤植。又，信中提及益子逞輔以池田家的土地（可能指臺北的住家）為擔保借了 8 千圓，內情雖不詳，是個值得留意的線索。

⁸⁰ 「池ノ上嘉普通恩給証書下付」(00003762002)；「書記池ノ上嘉昇給、賞與、依願免職」(1924 年 4 月 1 日)，〈大正十三年四月至六月人事書類專賣局〉，《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典藏號：00112439021。



圖一 1923年池田幸甚家族合照

說明：池田幸甚與夫人鏡育有5女1子：清子（1907年生）、秀子（1913年生）、治子（1915年生）、正子（1918年生）、喜子（1921年生），除了清子生於東京以外，妹妹們皆生於臺北；1924年初幸光（男）亦誕生於臺北。左起治子、清子、鏡手抱喜子、正子、池田、秀子。本相片由池ノ上宏提供及解說。

上嘉辭職後再度進入大成火災，日後獲得提拔而晉升經營高層。昭和初期1926年一本在臺灣出版、彙整出身鹿兒島等地的人名錄，誤植他為大成火災社長，⁸¹但他後來確實成為該公司的高層。工作方面，隨著升職，除了公司業務以外，池ノ上嘉也有機會在外演講等。例如1934年9月，臺灣產業組合協會舉辦第一回農業倉庫講習會，共11天，修畢者有100人；池ノ上嘉的題目是有關農業倉庫的保險實務（2小時），講述何謂保險，以及關於損害保險、火災保險的介紹，內容全文刊登於雜誌《臺灣之產業組合》。⁸²

池ノ上嘉似乎與林熊光頗有關係，儘管無法得知兩人的交情如何建立，可以

⁸¹ 福田廣次編，《臺灣商店日三州名刊錄》（臺北：臺灣薩隅日三州所，1926），頁138。該書後附的廣告名片頁也同樣誤植。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本書，可惜缺少封面，據內文推斷書名應為《臺灣在住三州出身者名鑑》。

⁸² 〈大成功を収めたる講習會經過報告〉，《臺灣之產業組合》（臺北）95（1934年11月），頁4-5。

確定的是，1925年林熊光擔任大成火災的常務取締役以後，池ノ上嘉即久任該會社在臺灣的總支配人，到1933年林熊光就任社長，池ノ上嘉先是兼任日本總支配人和東京支店支配人，進而於1937年升任取締役；1938年底林熊光辭社長職，1939年他也辭職（詳後）。⁸³ 姑且不論公司內部的人事問題等細節，無庸置疑的，大成火災時期的池ノ上嘉擁有較佳的經濟能力，可以扶養母親、妻、子女，並栽培第二代接受良好的教育。⁸⁴ 下節將針對池ノ上家第二代，特別是其中有3位就讀臺北高校的意義進行探討。

三、池ノ上家第二代的教育歷程

日治時期來臺的鹿兒島縣人頗多，已如前述，但在時人眼中似乎沒有特別傑出的人物。例如，1926年8月甫任臺灣軍司令官的田中國重（1870-1941），在寫給上原勇作（1856-1933）元帥的信中提到：「地理關係上，薩摩芋多數散布各地，但似乎少見有成功者。」⁸⁵ 這裡的「薩摩芋」意指鹿兒島縣人，田中應該是以有無位居要職等標準來審視「成功者」。若要了解來臺的鹿兒島縣人在官廳和民間活躍的情形，泉風浪的著作提供一份可觀的名單，惟僅止於介紹職稱和姓名。⁸⁶ 1940年出版的《九州文化大觀》，在介紹鹿兒島縣的「縣外名士」時，舉出在臺灣發展的幾位，他們幾乎都有擔任官員、總督府技師或地方議員等的經歷，理由不外乎對「島

⁸³ 連克、曾耀鋒，〈經營理念與派別之爭：日治時期大成火災海上保險株式會社經營始末〉，頁67。

⁸⁴ 池ノ上宏在其著書中（頁23）說明池ノ上嘉兩度任職專賣局的薪水與年末賞與的金額概況。簡言之，池ノ上嘉初任書記時月薪40圓，第一次進入大成火災時的月薪百圓，高於任書記的65圓；1923年離職時會社月薪已調為150圓；回任專賣局時月薪115圓，再次離開公職時月薪已調為135圓；至於再任職大成火災以後的薪資則無相關資料。但在說明第一次進入會社後的月薪百圓時，指出這筆錢包含住居費等，故不能說實質收入增加許多。不過根據益子寫給專賣局的文件，月薪百圓以外，會社提供每月津貼50圓及宿舍費35圓，到1923年4月退社時，月薪150圓以外，提供每月津貼75圓及宿舍費50圓。亦即住居費等並不算在月薪內，惟由此可見任職會社確實為池ノ上嘉帶來較佳的收入。參見「池ノ上嘉任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書記」，〈大正十二年自四月至六月人事書類（專賣局）〔1〕〉，《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公文類纂》，識別號：TMB_13_08_149，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下載日期：2021年8月29日，網址：<http://tais.ith.sinica.edu.tw>。

⁸⁵ 上原勇作關係文書研究会編，《上原勇作關係文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6），頁276。〔按：原文為日文，由筆者自行中譯〕。

⁸⁶ 泉風浪，《人と閩》（臺北：南瀛新報社，1932），頁193-210。

治」頗有功績。⁸⁷ 池ノ上嘉曾在專賣局任職，位階較低，對「島治」沒有顯而易見的事功，未被列入「縣外名士」也不足為奇。然而，如果不以來臺第一代的表現作為定義成功與否的判準，換個角度看他對子女的教育，則可謂極其成功。

1912年池ノ上嘉任職專賣局時，並未舉家遷臺，他先與母親渡臺，等生活穩定後才接妻子過來。⁸⁸ 池ノ上嘉夫婦有4子2女，除了長子池ノ上容於1910年在鹿兒島市出生以外，另5位都在臺灣出生，依序是池ノ上典（つかさ，1913年2月）、池ノ上和（すなお）與池ノ上章（あきら，1915年5月，雙胞胎）、長女池ノ上節子（1920年10月）、次女池ノ上幸子（1923年10月）。為具體探討池



圖二 1928年池ノ上嘉家族合照

說明：前排左起為池ノ上嘉、長女節子、母親キセ、次女幸子、妻ヨシ，後排左起為三男和、長男容、四男章、次男典；長男與次男就讀臺北高校，身穿制服，頭戴白線帽；三男與四男就讀臺北一中。本相片由池ノ上宏提供及解說。

⁸⁷ 他們是尾辻國吉、山本哲志、中馬中、川村直岡、筱原國憲、藤田淳教、市來吉至、池田斌、加治木藤之助、筱原武男、入佐藤次郎、銀屋慶之助。參見長里清編，《九州文化大觀》（東京：日本文化研究會，1940），頁1-6（鹿兒島縣部分）。

⁸⁸ 池ノ上宏，《台灣における日本統治の私的探求》，頁13。

ノ上家第二代的教育歷程，以下聚焦於就讀臺北高校的長子、次子與三子，以及就讀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簡稱臺北醫專）的四子。

創立於 1922 年的臺北高校，設有 4 年制的尋常科（每屆一班 40 人），招收小學校與公學校畢業生，再於 1925 年設立 3 年制的高等科（每屆又分文理兩科，各有甲乙兩類，每班 40 人）。自 1928 至 1946 年，高等科畢業的臺灣人約有 630 位，日本人則多達約兩千人，畢業生日後多進入各帝大或醫科大學等就讀，接著成為官僚、教授、醫師、企業經營者等，在各領域扮演菁英角色。⁸⁹ 池ノ上嘉有 3 位兒子畢業於臺北高校，1 位兒子畢業於臺北醫專，他們的求學歷程及大學畢業後的工作情形如下。

池ノ上容、典、和、章四兄弟都從當時臺北市升學率最好的小學校畢業。該校創立於 1913 年，原名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附屬小學校（依中文習慣簡稱附小），1927 年改稱臺灣總督府第一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日治末期以後屢次易名，現名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⁹⁰ 該校附屬於師範學校，所收學生並非全都是菁英家庭的子女，也有公務員、公學校老師、上班族等人的小孩在學。該校招收各種出身背景的孩童，施以高品質的教育，期能培養未來的菁英。⁹¹ 規模不大的這間小學，全校學生數約五百人，一到六年級學生彼此容易認識。該校的特色，正如畢業校友岸田實在一場座談會中所說的，乃是「少數精銳」集於一校，在良好師資的教導下成長。⁹² 該校學生的父親有不少人是總督府官僚、任教高等教育機

⁸⁹ 關於臺北高校的歷史及其特色，詳閱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新北：Airiti Press，2012）；蔡錦堂，〈新竹中學校出身的臺北高等學校生初探〉，《師大臺灣史學報》（臺北）10（2017 年 12 月），頁 123-150。

⁹⁰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百周年紀念專輯編輯委員會總策畫，《揮百年風華 灑世紀璀璨》（臺北：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2014），頁 6-7。

⁹¹ 為更了解附小的特質，筆者曾請教附小第三十六屆的光田明正先生（1936 年出生，本姓黃），其父母親為臺灣人，於日治時期至日本內地接受高等教育，相當重視子女教育；戰後 1950 年代黃家離臺赴日，1959 年歸化。光田先生從東京大學經濟學部畢業之後進入文部省任職，曾任學術國際局審議官，以及長崎外國語大學首任校長等職。筆者多年來從光田教授獲得許多啟發，謹此致上由衷的謝意。

⁹² 台北第一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第十一期生，《吾校》（東京：岸田實，1970），頁 6-17。本書為 1924 年畢業的第十一期生畢業 45 年紀念文集。發行人岸田實畢業後就讀臺北高校、東京帝大；戰前曾任總督府地方理事官，戰後曾任國會圖書館館長等職。岸田的夫人友子（舊姓森）也是該校畢業生（第十七期 1929 年畢業）。無論是否為青梅竹馬，附小的日本人畢業生中有不少人與校友結婚，這可以視為出身擁有相近的教育水準、資產條件的男女雙方家庭之間的聯姻（新人的父母可能是舊識），略可窺見中上階層的在臺日本人之親族網絡非常密切。

關者，以及醫師等社會聲望較高的知名人士。日本人家中有兩位以上從該校畢業的例子頗多，甚至有一家多達 7 人的情形。⁹³ 相對的，能進這間名門小學的臺灣人極其少數，約僅數十人而已。⁹⁴ 到 1946 年為止，該校約有 2,500 位畢業生，若加上 1945 年接收當時一到五年級在校生，則校友多達約 3,200 人。⁹⁵ 由以上的簡介可知，學童們概出身廣義的中上階層家庭，素質也高，從小就讀該校等於提早認識未來各界的菁英。池ノ上嘉的兒子都從這間必須經過考試才能就讀的升學名校畢業，可以說在學歷競爭的世界中已贏在起跑點上。

長子池ノ上容是附小第十屆 1923 年的畢業生，同屆男同學共 45 人（含曾在學而後轉出者，非最終畢業人數，以下同樣），經比對資料，其中 11 人後來就讀臺北高校；有的直接考入臺高尋常科，有的先就讀臺北州立第一中學校（簡稱臺北一中，今建國中學）後再進入臺高；他們從高校畢業的時間不一，最順利的就像池ノ上容一樣，小學畢業後從臺高尋常科念起，1930 年便能從高校畢業（理科乙類）。⁹⁶ 他接著就讀東京帝大農學部林學科，畢業後進入內務省從事與國立公園有關的工作。當時日本正著手設置國立公園，就在他大學畢業的 1933 年，5 月《官報》公布內務省增設職員，聘請技師、屬、技手等從事國立公園相關事務，

⁹³ 大里武二郎（曾任臺北地方法院長等職）的長男新太郎（後就讀臺北高校、東北帝大），以及 4 位女兒都是附小畢業。大里的長女與根井洸（總督府官僚）的兩位兒子也就讀附小，次子為前臺灣協會理事長根井洸。

⁹⁴ 1939 年第二十七屆畢業的林彥卿（醫師）曾以其手足為例，說明附小擇優錄取，通過考試後還有抽籤，故入學考試競爭激烈；他在著作中也介紹幾位臺灣人校友，例如蓬萊婦產科張文伴醫師的 3 位子女（張美惠、張寬敏、張寬容）等人，並提到第一位入學的臺灣人是 1927 年從他校轉入的許伯埏（許丙長子，1929 年第十七屆畢業）。參見林彥卿，《非情山地》（臺北：林彥卿，2002），頁 81-89。而根據同窗會名簿，最早畢業的臺灣人是第十六屆的周植金和許碧霞（許丙長女），最後畢業的 1946 年第三十四屆則可見辜濂松之名。又，《非情山地》書中提到的簡舜章，為簡敦洽醫師之子，1935 年從附小畢業後就讀臺北一中、慶應義塾大學醫學部，戰後初期畢業，在基隆開業，與基隆顏家顏滄波（臺高、臺北帝大畢業）為姻親，2021 年以百歲高齡去世。戰前曾就讀附小的臺灣人，如今僅極少數仍健在。

⁹⁵ 岸田實，〈序〉，收於台北第一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同窓會榕蔭會編，《台灣台北第一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の沿革（年表）》（東京：大磯幸雄公認會計士事務所，1990），未編頁碼；向山寬夫，〈母校の沿革など〉，收於榕蔭會昭和 2 年卒業第 14 期生會編，《あひるの行列：台北第一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卒業五〇周年記念文集》（東京：該會，1979），頁 79。

⁹⁶ 〈彙報 學事〉，《府報》第 911 號（1930 年 3 月 16 日），頁 49；台北第一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同窓會榕蔭會編，《榕蔭會會員名簿》（藤沢：台北第一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同窓會・榕蔭會，1998 年第 11 版），頁 31-32。池ノ上容以外，後來從臺高畢業的有田宮良策、若森倫次郎、芦田昇（舊姓天尾）、小島長男（舊姓大島）、衣笠俊男、渡邊久雄、瀨戶口宏邦、武井昌一、荒木宣夫、村上義朗。

編制屬於該省衛生局；不久之後，池ノ上容被任命為內務省衛生局囑託。⁹⁷ 他屢被派往各地進行調查，和同仁的活動及調查成果、參加座談會等行程，常被刊登於《國立公園》雜誌，此外在《造園研究》等刊物也有他的文章。

次子池ノ上典是附小第十二屆 1925 年的畢業生，接著就讀臺高尋常科，1932 年從高校畢業（理科甲類）。⁹⁸ 他為了考大學（推測是東京帝大）而上京，但未能考取，於是就讀東京工業大學窯業學科，1937 年畢業。大學畢業前他已確定可望進入旭硝子（玻璃製造公司）任職，但因為身體檢查結果不合格，未能如願，1936 年 12 月終於確定將來的出路，故畢業後即任職於黑崎窯業。⁹⁹

三子池ノ上和是附小第十五屆 1927 年 9 月的畢業生，在小學畢業典禮時曾獲頒獎，並代表畢業生致答詞，品學兼優。¹⁰⁰ 他與雙胞胎弟弟理當同屆，卻較早進入小學就讀，原因在於附小增設唯一的實驗性班級，招收本應於 1922 年 4 月入學的學童，提前於 1921 年 10 月入學；提早於秋天入學的做法，在當時的日本仍屬罕見。該班收男女學童各 15 名，且不再多收，除去轉學離開者，最後有 9 位男童和 7 位女童畢業。儘管學校有意讓該班學生以 5 年半畢業，最終學生還是必須讀滿 6 年，甚至於 1927 年 9 月畢業後，為銜接下一階段，又在學半年。該班男同學全數考上臺高尋常科或臺北一中，女同學都考上臺北州立第一高等女學校（一高女，今北一女中）。¹⁰¹ 附小的畢業生考入臺高尋常科和臺北一中等校的成績絕佳，當時有目共睹。¹⁰² 不過，池ノ上和和小學校畢業後並未就讀臺高尋常科

⁹⁷ 〈雜報 国立公園事務職員の設置〉，《國立公園》（東京）5:6（1933 年 6 月），頁 28；〈雜報：国立公園事務職員任命〉，《國立公園》5:7（1933 年 7 月），頁 27。

⁹⁸ 〈彙報 學事〉，《府報》第 628 號（1929 年 3 月 29 日），頁 90-91；〈彙報 學事〉，《府報》第 1472 號（1932 年 3 月 12 日），頁 26；台北第一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同窓会榕蔭会編，《榕蔭会會員名簿》，頁 38-39。其附小同屆男同學共 41 人，其中 13 人後來就讀臺高；池ノ上典以外，後來從臺高畢業的有高井五郎、河瀨健一、小川次郎、門多魁、加根魯三雄、浮田祐吉、大竹邦彦、大橋洵、岡千里、中野俊賢、中山謙吉，以及因故未能畢業的高桑（舊姓下川）末秀。

⁹⁹ 〈池ノ上嘉備忘錄〉；東京工業大學編，《東京工業大學卒業生名簿》（東京：該校，1942），頁 13。

¹⁰⁰ 〈附屬小卒業式〉，《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10 月 1 日，夕刊第 2 版。

¹⁰¹ 吉岡英一，《斷片集》（東京：金融財政事情研究会，1987），頁 3-6、10。

¹⁰² 以屆數相近的第十四屆 1927 年畢業的向山寬夫為例，該屆有 37 名男同學，3 名考進臺高尋常科，28 名考進臺北一中（包括向山），其餘 6 名分別考進臺北二中、基隆中學校、臺北商業學校、臺北工業學校、臺北第一師範學校、私立臺北商工學校，全部升學，沒有人在小學畢業後進入職場。參見向山寬夫，《向山寬夫自伝：我あり人あり喜寿を迎えて》（東京：中央經濟研究所，1991），頁 34-35。

(可能未考取)，而是臺北一中，¹⁰³ 接著進入臺高高等科，是家中第三位就讀臺北高校者，1935年畢業(理科甲類)，惟1937年才進臺北帝大理農學部農藝化學科，1940年畢業。¹⁰⁴ 何以未應屆就讀帝大，可能與他高校畢業後曾前往東京有關。根據1936年底調查完成的臺北一中畢業生名簿，當時他住東京澀谷區，¹⁰⁵ 或因報考東京帝大失利而就讀臺北帝大。大學畢業後，他任職於三井物產。

池ノ上容、典、和在臺高都是唸理科。至於池ノ上嘉的四子池ノ上章，是附小第十六屆1928年的畢業生，¹⁰⁶ 之後就讀臺北一中及臺北醫專，1937年從醫專畢業，相當於臺北帝大附屬醫專第一屆，¹⁰⁷ 不久後擔任海軍的軍醫少尉。¹⁰⁸ 值得一提的是，上文述及的名嘉山安忠醫師，其3子3女全都從附小畢業，長女嘉子與池ノ上容同屆，其後畢業於一高女，¹⁰⁹ 其他人的就讀學年大抵也相近。¹¹⁰ 其長子安孝於1930年從臺北一中畢業，1935年從臺北高校畢業，與池ノ上和同屆，後來就讀京都帝大法科。因此，池ノ上嘉和名嘉山安忠不僅是好友，他們的第二代也有同學或同校情誼。

池ノ上家四兄弟全都接受菁英教育，兩位妹妹也接受完整的高等教育。節子與幸子是否曾報考附小，無由得知，兩人先後就讀南門尋常小學校(今南門國小)與一高女，節子之後就讀實踐女子大學，幸子則就讀日本女子大學。¹¹¹ 顯然池ノ

¹⁰³ 台湾台北州立台北第一中学校同窓会，《麗正会名簿》(東京：該会，1991)，頁51。

¹⁰⁴ 〈彙報 宗教及學事〉，《府報》第2341號(1935年3月17日)，頁35；〈彙報 宗教及學事〉，《府報》第2976號(1937年5月11日)，頁21；〈彙報 宗教及學事〉，《府報》第3856號(1940年4月10日)，頁49。其附小同班同學中有3人後來從臺高畢業，分別是稻田孝、吉岡英一、村上恭平。

¹⁰⁵ 村山勇編，《卒業生名簿》(臺北：臺北州立第一中學校麗正會，1937)，頁105。

¹⁰⁶ 台北第一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同窓会榕蔭会，《榕蔭会會員名簿》，頁48-49。

¹⁰⁷ 〈彙報 宗教及學事〉，《府報》第1769號(1933年3月26日)，頁89；〈彙報 宗教及學事〉，《府報》第2950號(1937年4月9日)，頁43；菅野尚夫編，《會員名簿》(臺北：南溟會，1941)，頁35-38；台湾台北州立台北第一中学校同窓会，《麗正会名簿》，頁49。

¹⁰⁸ 〈通信欄〉，《南溟會會報》(臺北)11:1(1939年3月)，頁7；大磯友明編，《三州人會誌》(臺北：醫專三州人會，1939)，頁52；村山勇編，《會員名簿》(臺北：臺北州立臺北第一中學校麗正會，1939)，頁109。

¹⁰⁹ 名嘉山的長女嘉子為1923年第十屆畢業生，1927年從一高女畢業。參見臺北州立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編，《臺北州立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要覽》(臺北：該校，1929)，頁243。

¹¹⁰ 台北第一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同窓会榕蔭会，《榕蔭会會員名簿》，頁33-34、43、54、62、72。名嘉山的長男安孝1924年第十一期畢業，次女幸子1926年第十三期畢業，次男徹1929年第十七期畢業，三男繁1931年第十九期畢業，三女昌子1933年第二十一期畢業。徹與繁後來從臺北一中畢業。

¹¹¹ 池ノ上宏，《台湾における日本統治の私的探求》，頁29-30。該書提到節子與幸子從南門小學校畢業，不過根據重新打字的畢業生名錄，僅見1936年第二十六屆畢業的幸子之名，未能在前幾屆看到節子

上家的第二代都有良好的學歷與教養，其中尤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 3 位子弟就讀臺北高校的意義。

臺北高校有一個值得留意的現象，即兄弟先後入學的情形相當明顯，池ノ上家有三兄弟就讀該校，其中兩人從尋常科念起。¹¹² 據既有研究可知，該校的日本人學生多出身中上階層，臺灣人學生的家長則有頗多畢業於總督府國語（師範）學校或醫學校（醫專），概為中等或小康家庭以上。¹¹³ 由於缺乏該校學生最基本的學籍資料，沒有完整的名單可供查詢，僅能就閱見所及推知，家中有兩位以上就讀臺北高校的例子，在日本人方面較為常見，就初步了解約有一百多人，應不到兩百人。至於該校畢業生中的臺灣人兄弟總數約在 50 人左右，家中有三位兄弟以上就讀該校者已知約有 30 人。¹¹⁴ 對臺灣人而言，要考進該校已經很不容易，遑論兄弟相繼入學。關於這點，從當時的報紙報導，¹¹⁵ 以及家長的回憶，¹¹⁶ 就可以了解其難度及時人的評價。要之，日治中期臺灣人在受完初等教育後，就讀中學校的風氣並不興盛，能進而支持多名子弟從高校到大學畢業的家庭，更是為數不多，是以臺灣人進入臺灣的高教機關者，遠少於日本人。

家中有 4 位就讀臺高的日本人家庭，茲舉數例如下：矢野良一・矢野次郎・矢野三郎・矢野良男（父親是臺灣畜產株式會社高層的矢野政良），以及津野田嘉

之名。參見陳櫻桃、鄭志祥、鄭鳳綿主編，《酷樣年代 風華再起：臺北市南門國小百週年慶特刊》（臺北：臺北市中正區南門國民小學，2005），頁 300。

¹¹² 此一現象是否為臺北高校的特色，其他舊制高校是否可見類似情形，筆者仍無法斷言，有待探討。

¹¹³ 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頁 237-244。

¹¹⁴ 就閱見所及，包括朱華陽・朱彩陽・朱明陽（兄長朱昭陽、父親朱四海）、黃際沐・黃際鑫・黃際鍊（父親黃福成）、葉炳賢・葉炳哲・葉炳遠（父親葉有全）、潘迺興・潘迺均・潘迺禎（父親潘光楷）、李子賢・李思賢・李舉賢（父親李良弼）、陳麗水・陳麗生・陳麗澤（父親陳讚煌）、顏滄波・顏滄浪・顏朝邦（父親顏國年）、林金生・林新澤・林本仁（父親林開泰）、陳秩宗・陳炳宗・陳圻宗（父親陳錦標），以及家族中有多達 5 位子弟就讀臺北高校的陳（穎川）增福家族，他們是陳定燦、陳定松、陳定雄、陳定芳、陳定光。有關臺灣人校友的人際網絡，筆者曾寫信請教臺北高校畢業的黃伯超教授（曾任臺灣大學醫學院院長等職），感謝黃教授回覆賜知。

¹¹⁵ 報載「故稻江妙生醫院主葉有全氏，不幸於十年前去世，遺下五男一女。當時長者年僅十三，皆依寡母周氏教養」，長男葉炳輝、次男葉炳祥就讀醫專，三男葉炳賢、四男葉炳哲及五男葉炳遠就讀臺北高校，後兩人更是從太平公學校畢業後考進臺高從尋常科念起，一家有此良好的表現，故報紙評謂：「兄弟三人均應募高校，一試及第，誠難得也。」參見〈葉家兄弟 高校三及第 為本島人中罕見〉，《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3 月 21 日，夕刊第 4 版。

¹¹⁶ 陳錦標回憶，「臺籍之中學畢業生之能進入臺北高等學校就讀者，實寥寥無幾，長、次、三，三子在新竹中學校畢業後均先後很順利考進此學校，因之一時名震新竹州學界及學童家庭，為各界之所羨望」。參見陳錦標，《陳錦標回憶錄》（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9），頁 113。

彥·津野田豐彥·津野田泰彥·津野田京輔（臺中醫院長津野田誠吾）。家中有3位就讀該校的日本人家家庭，包括荒井涉·荒井澄夫·荒井淳（實業界的荒井賢次郎）、倉岡圭二郎·倉岡周南夫·倉岡正八郎（臺北醫院長倉岡彥助）、池ノ上容·池ノ上典·池ノ上和（大成火災高層池ノ上嘉）、大澤滋·大澤菊男·大澤敏夫（報界的大澤貞吉）、金子正久·金子光久·金子三郎（辯護士金子光太郎）、橫川敏雄·橫川宗雄·橫川清（臺北帝大教授橫川定）、內保一郎·內保三郎·內保四郎（齒科醫內保傳次）、小園江三郎·小園江五郎·小園江秀雄（貿易商及專賣局經銷商小園江隆哉）、木村英一·木村英世·木村英俊（地方公醫木村源喜）、山口正晴·山口進·山口尚（父親姓名與身分待查）、安房哲·安房淳夫·安房明（父親姓名與身分待查）……等。此一名單係比對各種名簿、參考既有研究及回憶錄等資料所得的初步結果（排序依家中就讀臺高的兄長屆次先後），應不止於以上所列舉者。¹¹⁷ 僅就以上所列的名單而言，他們的父親未必都是高學歷菁英，如專賣局經銷商小園江隆哉也培養3位子弟就讀臺高。¹¹⁸ 如所周知，1920年代高校與帝大在臺灣設立後，日本人子弟在臺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比臺灣人更具優勢，總督府官僚、教授及實業家等人的子弟有優越的條件進入高教機關就讀，而出身相對平凡的池ノ上嘉，當他在事業上力爭上游的同時，兒子們也在學業上光耀門楣，一代之間成為高學歷家庭。池ノ上家第二代6人之中，有4人的最終學歷是在東京完成，可以認為除了資賦優異以外，父母重視教育，加以兄長經驗的往下傳承，而能屢放異采。

四、戰爭前後的池ノ上家

池ノ上嘉的奮鬥史是池ノ上家族臺灣經驗的第一部曲，其子女均接受高等教

¹¹⁷ 此外，從姓氏可以推斷極有可能是兄弟的日本人（例如氏家春水、氏家秋果、氏家冬深），不在少數，惟有待相關資料印證。

¹¹⁸ 小園江隆哉，《回顧六十年》（臺北：小園江隆哉，1942），頁178-179。小園江隆哉膝下有4男3女（皆出生於福州），其中1女因病早逝。小園江於1920年代移居臺灣之後，其子女先後就讀臺灣的中高等教育設施。其中，長男於中學第四學年時參加臺北高校入學考試通過，但體格檢查結果被判定為不合格，而無法入學，中學畢業後就讀臺北高商；次子（三郎）、三子（五郎）、四子（秀雄）則全都於中學第四學年時考入臺高高等科，之後分別就讀神戶商科學、京都帝大法學部、京都帝大經濟學部。

育的成績為第二部曲，第三部曲則由兩段經驗所構成，包括戰時到戰後初期池ノ上家經歷的苦難與變故，以及池ノ上家離開臺灣以後與臺灣的關係。本節首先分析池ノ上嘉的離職與轉職，進而考察池ノ上家的戰爭經驗，以及戰後池ノ上家與臺灣的關係如何維繫。

（一）池ノ上嘉離開大成火災與轉任新職

池ノ上嘉任職大成火災以後，與家人在臺北享有安定的生活，子女先後進入臺灣的中高等教育機關，第二代也已有人從大學畢業進入職場。而在人際網絡方面，雖然不清楚他與鹿兒島縣或沖繩縣人士的往來情況（例如在臺同鄉會、同學會等），偶爾接待則不難想見。例如，他在中學校時的同學、後來任教東京府立高等學校的東恩納寬惇，於 1933 年考察東南亞等地時，途中曾兩度來到臺北，就住在摯友池ノ上嘉的家中。¹¹⁹

池ノ上嘉於 1935 年 6 月上京，至 1938 年底在內地任職，當時住在澀谷區眾樂町。¹²⁰ 這段期間他在臺、日兩地活動的情形，根據參與大成火災的林獻堂(1881-1956)之日記等資料可得見一斑。例如 1935 年 10 月 9 日，林獻堂人在臺北，上午前往大成火災訪問林熊光，「不遇，與池上支配人坐談數十分間。」¹²¹ 1937 年 2 月池ノ上嘉擔任取締役，在此之前他需兼顧東京與臺北兩邊的業務，因為東京支店副支配人高野孫一¹²² 升任該支店支配人，使池ノ上嘉得以將重點置於臺北本社。¹²³ 又如 1937 年 3 月 5 日，益子逞輔與池ノ上嘉前往霧峰拜訪林獻堂，「雜談時局約一時間。」¹²⁴ 再如 1938 年 3 月 7 日，林獻堂人在東京，其日記寫著：

¹¹⁹ 東恩納寬惇，《東恩納寬惇全集 3》（東京：第一書房，1993 年再版），頁 598、631。

¹²⁰ 〈人事 池ノ上嘉氏〉，《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8 月 11 日，第 2 版；池ノ上宏，《台灣における日本統治の私の探求》，頁 18-19。

¹²¹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4），頁 357。〔按：本文引用林獻堂日記時，部分參酌註解者修訂過的文字，原文如有漏字等情形，則不予呈現〕。

¹²² 高野生於 1884 年，岡山縣人；1910 年從中央大學英語科畢業，旋進入大倉組任職，1928 年進入大成火災，曾任該社大阪支店長。參見中西利八編，《財界二千五百人集》（東京：財界二千五百人集編纂部，1934），頁 589。

¹²³ 〈大成火災總會〉，《臺灣日日新報》，1937 年 2 月 27 日，第 3 版；〈大成火災臨時總會〉，《臺灣日日新報》，1937 年 3 月 17 日，第 3 版。

¹²⁴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

「大成火災保險會社支配人使呂漱石來，言本社有重要之書類欲蓋印，請余電命家人帶印往臺北本社云。余即修書與內子，並使成章代修書與猶龍，言帶印往臺北，若有不便，可以電話與池上嘉交涉，使一社員帶書類來霧峰蓋印。二書皆赴明日航空郵便。」¹²⁵ 林獻堂寫信給夫人楊水心，並請溫成章也寫信給林的次子，傳達要林猶龍帶印章到臺北，以便在會社重要的文件上蓋印，否則請池ノ上嘉派人南下到霧峰處理此事。由上可見池ノ上嘉的日常業務與交遊之一端。

1939年8月池ノ上嘉辭職，原因與公司高層間的人事對立有關。1939年2月2日，林獻堂上午往訪總督小林躋造等人，午後先到民報社見羅萬俔，接著出席大成火災的重役會，其在日記中寫道：「出席者專務益子逞輔、陳啟貞、陳振能、蔡法平、池ノ上，監查役吳澄琪。本期結算純益金三十二萬餘円、配當五分，皆從原案可決。次益子提出前社長林熊光辭退，欲選門野〔按：門野重九郎〕為社長；余謂門野有病不能任事，當選赤司〔按：赤司初太郎〕為宜；益子言前月重役會已決定矣；視其決議錄果然。」接著議論關於以高野孫一支配人為取締役案，林獻堂又加以反對，他寫道：「余又反對其不可，因去年排斥社長之首謀者，而使其為重役，是獎勵亂暴之行為也；爭論頗久，啟貞提議再問赤司之意見，然後決定。五時餘招柏壽、萬俔、呈祿、煌、忻、聰明、瑞騰往北投八勝園晚餐。十時餘歸來，接赤司初太郎之電報，贊成高野為取締役，余之反對皆為無效矣。」¹²⁶ 同年7月10日，大成火災的重役會在東京澀谷的赤司宅邸召開，參加者有林獻堂、李延禧、益子逞輔、顏欽賢。席間，「益子專務乃說明池ノ上嘉取締役兼支配人辭職，欲用大阪支配人橋本〔按：橋本關一〕為臺灣支配人，欲選在臺灣之藤江〔按：藤江醇三郎〕為取締役，八月在臺灣開臨時總會，原案可決。」¹²⁷ 翌月，池ノ上嘉的辭職獲得通過；¹²⁸ 15日當時人在輕井澤的林獻堂收到大成火災的電

史研究所，2004），頁86。

¹²⁵ 林獻堂著、許雲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九三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4），頁62。

¹²⁶ 林獻堂著、許雲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三九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6），頁54。相關報導參見〈大成火災的新社長〉，《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2月4日，第2版。

¹²⁷ 林獻堂著、許雲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三九年》，頁261。

¹²⁸ 〈大成火災の臨時總會 取締役池上嘉氏辭任、補缺に藤江氏〉、〈東西南北〉，《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8月11日，第2版。

報，內容係有關池ノ上嘉取締役辭任登記委任狀蓋印事宜，「即命成章以電話告之曰印在霧峰，可使人往蓋也。」¹²⁹ 28日在臺北鐵道旅館舉行的大成火災臨時股東總會上，藤江醇三郎當選取締役，橋本關一則就任成為臺北本社的支配人。¹³⁰

池ノ上嘉之進入大成火災係受到益子逞輔的拔擢，而離開會社則是因為益子與林熊光的關係生變之故，至此與會社的關係劃下休止符，總計在大成火災服務約 18 年。翌年他在平田末治的邀請下，成為開洋興業的監查役。以下先簡介平田的經歷，接著利用有限的資料說明池ノ上嘉參與開洋興業的情形。

平田末治（1893 年生，秋田縣人）於 1916 年來臺，先入基隆金瓜石株式會社田中礦山工作，翌年離職，轉往打狗（高雄）從事プラタス島（Pratas，東沙）海人草採集及沉船解體業，不久後發現パラセル（Paracel，西沙）群島富含磷礦（鳥糞），即著手磷礦生意，並經營土木建築等行業，1920 年代起又任協議會員等職；他擁有組合長、理事等多種頭銜，活躍於地方事務。1936 年 5 月，平田設立開洋興業株式會社，就任常務取締役。¹³¹ 開洋興業從事漁業、海產物製造販賣、鳥糞的採掘販賣等業務；本店設於高雄市，資本總額 10 萬圓（分 2 千股），每年 5 月召開總會，必要時得召集臨時總會；人事方面，取締役任期 3 年，監查役任期 2 年。該會社最初的陣容如下：楨哲（取締役社長）、平田末治（常務取締役）、伊藤文吉、森轟昶、島田利吉（取締役）、安部信治、勝又獎（監查役）。¹³² 此外，平田為開發西沙群島的磷礦，另於 1938 年 8 月設立開洋燐礦，¹³³ 到 1940 年初退任社長，經營權交給臺灣拓殖株式會社與日本礦業。¹³⁴ 1940 年 10 月，池

¹²⁹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三九年》，頁 298。

¹³⁰ 〈大成火災總會 藤江醇三郎氏 取締役に就任〉，《臺灣日日新報》，1939 年 8 月 29 日，第 2 版。

¹³¹ 「平田末治（囑託；一時手當；勤務）」(00010240007)；「平田末治（東沙リーフニ於ケル海人草漁場調査ニ關スル事務ヲ囑託ス）」(00010252053)；「製造煙草直接消費者へ賣渡ニ關スル決議書（昭和十三年度分一括）（皇軍慰問用、西沙群島開洋礦業從業者用、艦隊慰問用）」，〈昭和十三年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公文類纂煙草永久保存第七冊〉，《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典藏號：00101339006；「平田末治囑託」，〈昭和十三年十月至十二月人事書類專賣局〉，《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典藏號：00112503091。

¹³² 〈定款 開洋興業株式會社〉，明治 39 年（1906）8 月，《海軍省公文備考》（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檔號：C05035339800，引自「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下載日期：2020 年 6 月 6 日，網址：<https://www.jacar.go.jp/>。

¹³³ 千種康允，《臺灣縱橫觀》（東京：經濟市場社，1939），頁 375。

¹³⁴ 〈開洋燐礦が本格採掘〔掘〕〉，《高雄新報》，1940 年 2 月 24 日，第 3 版。有關平田發現西沙群島之磷礦，及其在該地從事的採掘活動，詳見朱德蘭，《臺灣沖繩交流史論集》（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頁 161-193。此外，從廣域的角度探討日本對亞洲各地磷礦資源的經營情形，詳閱

ノ上嘉在平田的邀請下，擔任開洋興業監查役。¹³⁵ 此外，1944年5月，有限會社丸二組造船鐵工所的高層人事異動，平田末治成為取締役兼代表取締役，池ノ上嘉則成為監查役。同月，池ノ上嘉再任開洋興業監查役。¹³⁶ 要之，池ノ上嘉卸下忙碌的大成火災取締役工作後，轉而在他社擔任監查役，直到戰爭末期都在臺灣。

(二) 池ノ上家族的戰爭經驗與離臺

1937年7月日本與中國爆發戰爭，1941年12月日美開戰，初期日軍占上風，待日軍在太平洋各地轉居劣勢，臺灣也面臨盟軍飛機空襲與可能登陸的威脅，島上人們都被迫過著緊張嚴肅的生活，池ノ上家族亦不例外。對年近六旬的池ノ上嘉而言，最大的變化應是兒子們受召出征與一子戰死。

池ノ上家的大哥池ノ上容，1938年任厚生省體力局囑託（配置於施設課），他與池田正子結婚後，前往山西省的大同都市建設局任職，擔任土木科長。¹³⁷ 1939年3月池ノ上容出發之前，父親與二弟池ノ上典到門司送行；池ノ上容在中國期間，與正子曾到內蒙各地觀光。¹³⁸ 1941年池ノ上容返臺後，則在臺灣神宮造營奉贊會工作。¹³⁹ 同年的臺北高校同窗會名簿顯示，池ノ上容任職於臺灣神社

張素玠，〈獵島行動：西太平洋島嶼的鳥糞採礦與國際勢力的角逐〉，收於《近代臺灣與東南亞》論文集編輯出版委員會主編，《近代臺灣與東南亞》（新北：國立臺灣圖書館，2019），頁185-215；湯熙勇，〈日本臺灣總督府經營南海諸島的歷程及其意涵（1907-1945）〉，收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輯組編，《第11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21），頁347-366。

¹³⁵ 池ノ上宏，《台湾における日本統治の私の探求》，頁27。該書介紹池ノ上嘉擔任監查役時的名片。而在千草默仙編輯的《會社銀行商工業者名鑑》中，開洋興業監查役最初是安部信治、勝又獎，之後改為黑田秀博與安部信治，未見池ノ上嘉的名字，應為作業疏失。參見千草默仙編，《會社銀行商工業者名鑑》（臺北：圖南協會，1937年第6版），頁216；《會社銀行商工業者名鑑》（1938年第7版），頁263；《會社銀行商工業者名鑑》（1939年第8版），頁186；《會社銀行商工業者名鑑》（1940年第9版），頁252；《會社銀行商工業者名鑑》（1941年第10版），頁235；《會社銀行商工業者名鑑》（1942年第11版），頁147；《會社銀行商工業者名鑑》（1943年第12版），頁138。

¹³⁶ 〈商業登記〉，《官報》第685號（1944年6月25日），頁120；〈商業登記〉，《官報》第749號（1944年8月28日），頁126。

¹³⁷ 鈴木清幹編，《蒙疆年鑑》（張家口：蒙疆新聞社，1941），頁3（人名錄之部）。

¹³⁸ 〈池ノ上嘉備忘錄〉；池ノ上宏信件。

¹³⁹ 1936年總督府計畫改建及擴張臺灣神社的社殿，同時規劃神社整體空間的改造，以此作為紀念「皇紀二千六百年」（即昭和15年，1940年）的一環；翌年編列連續四年度的相關預算，並設置臺灣神社臨時造營事務局（由文教局長擔任事務局長），開始著手造營事業，但因受戰爭影響，面臨物資調度等困難，工程未能如期展開。另一方面，總督府也組織「官幣大社臺灣神社御造營奉贊會」，募集資金以興建神社外苑及附屬設施；該會由總督任總裁，總務長官任會長，文教局長任副會長，全島各州廳設有

造營事務局，住在臺北市大正町；池ノ上典任職於黑崎窯業，住在八幡；池ノ上和任職於三井物產大阪支店，住在大阪。¹⁴⁰ 同一年，池ノ上典結婚，對象是池ノ上嘉的鹿兒島故鄉關係者，即有村善吉的女兒トヨ。此門婚事應為池ノ上嘉的安排。¹⁴¹

到了 1943 年 1 月，池ノ上嘉的三子池ノ上和出征，4 月戰死於中國，7 月雙胞胎弟弟池ノ上章才知道死訊，淚泣一週不已。¹⁴² 戰爭時期報紙在公開出征軍人的死訊時，常見的用語是「散華」（指年輕軍人為國捐軀）等詞彙，用以紀念戰死者，將此視為無上的榮譽；有時記者會訪問家人的感想，或報導官方派員進行慰問，以及骨灰送回家人手中的情景。¹⁴³ 報載時任步兵少尉、身為隊長的池ノ上和率軍作戰，戰死於中國山西省馬頭山附近；報紙介紹池ノ上家的成員，有高齡的祖母、雙親、出征中的池ノ上容〔按：1942 年 7 月受到召集〕，以及「產業戰士」池ノ上典、出征中的弟弟池ノ上章，另有兩位妹妹。池ノ上和為國犧牲，另有兩位兄弟出征中，故以「軍國一家」形容。並訪問母親ヨシ，她向記者表示：兒子喜歡運動，從小即很有活力，這麼早就戰死，內心感到非常遺憾，沒能為國做更多的奉獻，據說他光榮地戰死，聞之安心。¹⁴⁴ 家人戰死異國，池ノ上家陷入愁雲慘霧之中。值得一提的是，臺北帝大理農學部教授佐藤正一為紀念池ノ上和，特地將他的畢業論文其中一部分刊登於學報。¹⁴⁵

池ノ上典擔任「產業戰士」，應與其窯業工作的專長有關。所謂「產業戰士」，是戰爭時期（尤其 1940 年代）常被使用的詞語，意指在工廠作業的勞工，雖然不在前線，因為從事軍需生產，等於是在後方增強國力，故有此稱。擁有高學歷的池ノ上典，畢竟不是一般的勞工，惟由此可見在時代風潮下媒體用語的特色。至

支部，由各州知事及廳長任支部長。詳閱蔡錦堂，《日本帝國主義下台灣的宗教政策》（東京：同成社，1994），頁 149-150。

¹⁴⁰ 山地清編，《會員名簿》（臺北：臺高同窗會，1941），頁 58、77、110。

¹⁴¹ 〈永井家、隈元家、園田家、池ノ上家、岩崎家關係圖〉。有村善吉的另一位女兒良子，則於 1945 年與池ノ上章結婚。換言之，兄弟同時也是連襟。

¹⁴² 池ノ上宏，《台灣における日本統治の私的探求》，頁 31。

¹⁴³ 周婉窈，〈美與死：日本領臺末期的戰爭語言〉，收於黃富三、古偉瀛、蔡采秀主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頁 85-99。

¹⁴⁴ 〈山西戰線に散華 運動好きの 池上和少尉〉，《臺灣日日新報》，1943 年 7 月 25 日，第 3 版。

¹⁴⁵ 池ノ上和，〈水牛肉蛋白質の營養化學的研究〉，《熱帶農學會誌》（臺北）15:3（1943），頁 70-77。由此文可知池ノ上和去世後被追封為中尉。

於池ノ上章則是擔任海軍軍醫，轉戰各地。戰爭時期池ノ上家兄弟的足跡，有的在日本國內，有的在中國北方與內陸，有的在南方海面上，戰爭使人們的移動範圍異常地遙遠，對骨肉離散造成莫大的衝擊。

池ノ上家的另一個變故是，當年隨池ノ上嘉來臺的老母親キセ在臺過世。1941年6月，池ノ上家在蓬萊閣（位在大稻埕一帶，今南京西路圓環附近）¹⁴⁶慶祝キセ的88歲生日（米壽），池ノ上典與幸子都回臺為她祝壽，一家難得團聚。到了戰爭末期，美軍空襲臺灣日益頻繁，據池ノ上嘉的記載，1944年10月的大空襲讓全家從凌晨3點半進入待避壕，直到下午5點才結束，連日的長時間避難導致キセ的身體衰弱，雖延醫看診，但病情沒有起色，於該年12月逝世，享壽89歲。¹⁴⁷

1945年戰局益加嚴峻，池ノ上嘉的備忘錄記載，5月31日上午去北投與平田未治協議事情，這天臺北遭受大空襲，他寫下「瞬間成為廢墟」。¹⁴⁸8月日本戰敗，9月解除召集的池ノ上容與疏散至臺南的家人（妻正子、長子宏、次子清），¹⁴⁹回到臺北佐久間町一丁目一番地池ノ上嘉的住家（今郵政博物館一帶）。此時的家庭成員有7人，即池ノ上嘉夫婦、長子一家、次女幸子。池ノ上嘉開始整理私有財產清冊等，1946年1月其家宅被接收。¹⁵⁰不久後全家面臨被遣返的命運。

二次大戰結束後，在臺灣的日本人約32萬餘人（軍人除外）。據調查，其中約有14萬餘人，相當於四成以上願意留在臺灣。蓋戰後初期的日本，飽受戰時空襲的結果，滿目瘡痍，加以各種物資均告欠缺，人民生活不見得比在臺灣容易，且戰後日本淪於被占領的狀態，歸國未必是個好選擇。不過大約1945年底或1946年初，鑑於臺灣的情勢逐漸惡化，日本人不禁開始轉念，終於放棄留在臺灣的想法。從臺灣返回日本的日本人，依規定僅能攜走少量的簡易行李，現金也不得超

¹⁴⁶ 蓬萊閣開業於1927年，是日治中後期臺北具代表性的高級餐館之一，營業至1955年。詳閱陳玉箴，《「台灣菜」的文化史：食物消費中的國家體現》（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0），頁77-85。

¹⁴⁷ 池ノ上宏，《台湾における日本統治の私的探求》，頁33-34。

¹⁴⁸ 〈池ノ上嘉備忘錄〉。

¹⁴⁹ 根據池ノ上宏信件，戰爭末期正子帶家人南下，可能是因為三姉治子與先生金成元彦（任職明治製糖）、長男行彦住在麻豆的明糖社宅，因而前往臺南。金成的學經歷是1919年自東北帝國大學畢業（法學士），任職明治製糖會社，戰後被總爺糖廠留用後才返回日本。參見淺野良編，《會員氏名錄》（東京：學士會，1943），頁125；何鳳嬌編，《政府接收臺灣史料彙編（下冊）》（臺北：國史館，1990），頁840。

¹⁵⁰ 池ノ上宏，《台湾における日本統治の私的探求》，頁58。

過千圓。相關的回憶文字顯示，日本人對此感到無奈，只得擺攤求售自家物品，或交予臺灣人保管。¹⁵¹ 池ノ上家族應有類似的遭遇。

如前所述，日本人家族有的在臺灣居留時間長達三、四十年。戰後日本人離臺前，臺灣的報紙雜誌有不少關於在臺日本人的報導與論述，其中一則相當有意思。1946年2月28日，《人民導報》的社論題為〈寄回國的日本僑民〉，略謂：「從最近起，留在臺灣的日僑將一批批的回到日本去。日本帝國主義用武力奪取臺灣奪去了五十一年。大部分的日本人在臺灣都有深長的歷史。單位數字差不多用『十』來計算。有的十年、二十年，日子長一點的，根本上四十年了。在同一的地方過著這樣長久的生活，臺灣的氣候又是這麼溫暖，臺灣的風光又這麼綺麗，今天要離開了，誰都有些依戀。」這篇社論將日本人清楚劃分成「軍閥官僚和財閥」以及一般人，意在批判前者帶給日本人民痛苦，不僅使許多人「帶著辛酸和眼淚回去日本」，更給中國人及全人類帶來痛苦。並認為「日本人能夠帶回自己的衣物、飯具，已幸福多了。」同時，呼籲「回去吧！有理智的日本人，把日本軍閥殘餘的勢力清出去，把民主日本建立起來！……到了世界是人類的一個大家庭，那麼你們再回來臺灣吧，那時我們一定歡迎你們！熱烈的歡迎你們！以天下一家親的資格來歡迎你們！」¹⁵² 1912年來臺的池ノ上嘉，可說是資深的在臺日本人，然而他離開臺灣之後不復有機會再來，只有長子等人再度來臺。以下說明池ノ上嘉離臺與突然過世的過程。

1946年池ノ上嘉與家人返回日本，長女一家稍晚才回國。¹⁵³ 離臺之前，池ノ上嘉進行母親キセ與三子池ノ上和的分骨，並處理意外發生的險遭留用事件。事件起因於池ノ上嘉收到臺北市日僑輸送管理站（站長游彌堅）的通知單，內容謂：「查該日僑業經核定暫時留臺工作請不必作歸國準備。」他隨即向古亭區長提出請求，開立證明他已於當年1月辭去開洋興業監查役，現為無職狀態，藉此擺

¹⁵¹ 歐素瑛，〈戰後初期在臺日人之遣返〉，《國史館學術集刊》（臺北）3（2003年9月），頁201-227；吳文星，〈戰後初年在臺日本人留用政策初探〉，《臺灣師大歷史學報》（臺北）33（2005年6月），頁269-285。

¹⁵² 〈寄回國的日本僑民〉，《人民導報》，1946年2月28日，第1版。〔按：引用原文時，標點符號經過調整〕。

¹⁵³ 節子於1944年結婚。她的先生是長信彥，1922年自東京帝大畢業（法學士），任職臺灣銀行。參見淺野良編，《會員氏名錄》，頁279。根據池ノ上宏信件，戰後長信彥被留用，1946年底回國；日後在東京的纖維相關會社工作到退休。

脫被留用的可能。一行出發前還須通過健康檢查與持有檢疫證明書等，此時他與長子都有疾病在身。¹⁵⁴ 池ノ上家族與絕大多數在臺日人是第一批被遣返者。據時人回憶，1946年3月第一批引揚者之中，包含戰時出征軍人的遺族。¹⁵⁵ 或可推想他們受到安排，得以提早離開臺灣應與三子池ノ上和戰死有關。3月26日，池ノ上嘉等人乘車至基隆候船，翌日乘船出發，31日抵達和歌山縣的田邊港，下船上岸則是4月6日。¹⁵⁶ 田邊港是從臺灣被遣返回日本者上岸的主要港口之一。¹⁵⁷

厚生省田邊引揚援護局於1946年2月20日開始運作，24日即有來自基隆的第一艘引揚船入港，最後入港的則是6月下旬來自西里伯斯島（今名蘇拉威西島）的巴里巴里。總計有63艘的引揚船，來自基隆的有27艘（2月2艘、3月21艘、4月4艘），占總數的四成，其餘則來自中國的華中和華南以及南方海域各地。從臺灣抵達田邊港的引揚者有9萬3,599人，其中7萬5,904人為陸海軍以外的一般日本人，¹⁵⁸ 其中包括池ノ上嘉及其家人。池ノ上家族下船後，接受預防接種等之後，4月8日搭火車離開，經過京都、門司，終於抵達位在八幡的池ノ上典家。15日池ノ上嘉夫婦離開八幡，翌日回到故鄉鹿兒島。¹⁵⁹ 對池ノ上嘉而言，自3月前後開始準備被遣返，在一個半月內歷經舟車勞頓的迢迢歸鄉路，應是頗重的負荷。

戰爭末期鹿兒島受創甚鉅，戰後鹿兒島港被指定為引揚港之一，主要接受從中國回國的人士；由於戰前縣民赴海外謀生者甚多，引揚者約占縣民人口的一成。¹⁶⁰

¹⁵⁴ 池ノ上宏，《台湾における日本統治の私的探求》，頁60。

¹⁵⁵ 瀨辺惠鎧，〈戰没した三人の同僚〉，收於蕉葉會編，《台北高等學校：1922年-1946年》（東京：蕉葉會，1970），頁261。

¹⁵⁶ 池ノ上宏，《台湾における日本統治の私的探求》，頁65-66。有關日本人離臺之前在基隆的情景，簡明的敘述可參見戴維理（Evan Dawley）著、堯嘉寧譯，《成為臺灣人：殖民城市基隆下的民族形成（1880s-1950s）》（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1），頁255-256。

¹⁵⁷ 田邊以外尚有大竹、鹿兒島、宇品、佐世保；部分則是從名古屋、浦賀、博多（福岡）上岸。參見河原功，〈『台湾引揚者關係資料集』解題〉，收於河原功解題，《台湾引揚者關係資料集（第1卷）》（東京：不二出版，2011），頁5。有關田邊一地的引揚情形，詳閱田邊市教育委員會編，《引揚港田邊：海外引揚五十年》（田邊：田邊市，1996）。

¹⁵⁸ 加藤聖文監修・編集，《海外引揚關係史料集成（国内篇 第5卷）》（東京：ゆまに書房，2002），頁1、19-22。

¹⁵⁹ 池ノ上宏，《台湾における日本統治の私的探求》，頁66-67。

¹⁶⁰ 鹿兒島市編，《鹿兒島のおいたち》（鹿兒島：該市，1955），頁617。根據厚生省的調查資料（1961年底時），日本全國的復員（軍事方面）與引揚者多達近629萬人，其中鹿兒島的部分，有軍人約6.8萬人、軍屬7千餘人、一般在留邦人（在外民間日本人）17萬餘人，合計約24.6萬人。戰後初期鹿兒島

鹿兒島縣民一方面要著手重建家園，又要接納來自縣外及海外的鄉親等，各種棘手的工作紛至沓來。而為有效處理從海外各地被遣返者的相關事宜，1946年1月鹿兒島引揚援護局開始從事各項業務，運作至翌年初結束。期間該局之內設有臺灣引揚者鹿兒島連絡相談所，負責人為市來吉至（前總督府官僚），旨在照顧縣內的臺灣引揚者，功能包括互相聯絡、介紹工作等。¹⁶¹ 一般而言，戰後初期日本人對從海外歸來者，絕大多數抱持負面的態度，故從海外回到日本者面臨諸多難題。¹⁶² 限於資料對該所沒有更多的資訊，但可推測池ノ上嘉似乎沒有得到幫助。

從池ノ上嘉寫給仍在八幡的長子與次子的信可知，他先暫住在友人西良啟的家中，¹⁶³ 苦惱於住處與糧食問題，只能到外地去進行以物易物，而農民卻不要金錢，只有拿有用的東西來換才肯交易，偏偏從海外歸國者所持有的東西甚少，且未必了解當地情況，苦不堪言，因此考慮也許再回八幡。¹⁶⁴ 5月初池ノ上嘉又寫信給長子和次子，談及次女幸子的婚事，對方是園田勝彥（1919年出生於臺南）。園田家是今和泉村的同鄉，勝彥的祖父園田豐彥亦有豐富的臺灣經驗，¹⁶⁵ 豐彥的長女ツヤ與池ノ上嘉姨丈永井德照之弟永井太郎結婚（永井婚後改姓園田），勝彥是ツヤ與太郎的次子。¹⁶⁶ 豈知池ノ上嘉於同月13日在今和泉村去世，其遺體

縣的人口約160萬人，引揚者約占全縣人口的一成。參見鹿兒島縣編，《鹿兒島縣史》，第5卷下（鹿兒島：該縣，1980），頁1496。

¹⁶¹ 加藤聖文監修・編集，《海外引揚關係史料集成（國內篇 第11卷）》（東京：ゆまに書房，2002），頁3-11、218。

¹⁶² 關於此點，華樂瑞（Lori Watt）有專章討論，參見華樂瑞（Lori Watt）著、黃煜文譯，《當帝國回到家：戰後日本的遣返與重整》（新北：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65-106。

¹⁶³ 西良啟於1915年前往臺灣，工作是新營郡後壁庄烏樹林製糖會社員。參見福田廣次編，《臺灣商店日三州名刊錄》，頁139。池ノ上宏的書則指出，西良啟似乎曾是明治製菓株式會社在臺北開設的喫茶店之店主，大約與池ノ上嘉同時被遣返回日本，1950年代曾任當地的村長〔按：村並非村落，而是地方的行政區劃單位，町村相當於鄉鎮〕參見池ノ上宏，《台湾における日本統治の私的探求》，頁69。有關西良啟的生涯，另可參見池ノ上宏、德田順作，《日本統治下の台湾に渡った今和泉村の村びと》，頁101-128。

¹⁶⁴ 池ノ上宏，《台湾における日本統治の私的探求》，頁67-69。

¹⁶⁵ 園田豐彥舊姓松元，1870年出生，北海道札幌人，1891年擔任今和泉村役場書記，1893年與園田ヒ口結婚，入籍園田家。1897年1月渡臺，2月任臺中縣雇員，1899年5月任該縣監獄書記，至1909年10月以生病為由辭職（時任臺北監獄監吏）。復於1912年4月起，任宜蘭廳屬；1920年9月改任臺北州屬，到1921年底以生病為由辭職。參見「園田豐彥恩給證書送付ノ件（臺北廳）」（00001601016）、「園田豐彥（任宜蘭廳屬）」（00002065053）；「恩給證書下付（園田豐彥）」（00003267012）；池ノ上宏信件。

¹⁶⁶ 園田太郎比池ノ上嘉年長十餘歲，論輩分則是上一輩，因此園田勝彥與幸子結婚，等於是和晚輩結婚。

由隈元家（池ノ上嘉母親出身家庭）的親戚，也就是池ノ上嘉的表弟以火車護送至鹿兒島，長男池ノ上容在車站領取遺體後，將骨灰埋葬在鹿兒島的墓地，三位兒子等人都參加了喪禮。¹⁶⁷ 池ノ上嘉的死亡通知寄送對象，包括在臺灣時與他關係密切的益子逞輔（地址在目黒）、林熊光（輕井澤）、平田末治（東京赤坂）。6月幸子與園田勝彥結婚，了卻池ノ上嘉一樁心事。¹⁶⁸ 池ノ上家也迎來了新成員，池ノ上容的三子池ノ上晉在同年9月誕生。¹⁶⁹ 池ノ上嘉夫人ヨシ在先生去世後前往東京，與長男一家住在文京區大塚，於1968年8月去世。值得補充說明的是，池田覬也住在這裡，曾有臺灣人來訪，代其聯繫朱昭陽兄弟。¹⁷⁰ 池田覬在女兒、兒子、媳婦、孫子們的陪伴下，度過幸福的晚年，於1962年去世。¹⁷¹

（三）返日後的池ノ上家與臺灣

二次大戰結束、在臺日本人回國之後，紛紛成立各種臺灣關係團體；有的在臺時居住的地域（例如各州廳）為主，有的在臺時任職的單位或軍隊為主，而為數最多的當屬以母校畢業生為主體的各種同學會。池ノ上家第二代離臺後仍與臺灣保持關係，方式之一即是參加同學會等組織，另一方式則是訪問臺灣，舊地重遊並進行交流。試以池ノ上容、典、章兄弟為例加以說明。

池ノ上容於1947年擔任東大附屬演習林的囑託，1948年起任職於厚生省公眾保健局國立公園部（後改為厚生省大臣官房國立公園部），1962年起擔任財團

¹⁶⁷ 池ノ上宏信件。

¹⁶⁸ 補充一提，池ノ上嘉離臺前曾與平田末治聯繫；其備忘錄記載3月22日平田來訪，攜走行李。池ノ上嘉抵達日本、返回鹿兒島途中，也在熊本與平田面談。另外，池ノ上容抵達八幡後，妻正子與二子前往東京文京區的池田家，池ノ上容則繼續留在當地養病。參見〈池ノ上嘉備忘錄〉；池ノ上宏，《台湾における日本統治の私的探求》，頁28、70。

¹⁶⁹ 池ノ上容夫婦育有4子，第四子池ノ上功於1951年12月出生。參見武內甲子雄編，《人事興信錄》，上卷（東京：人事興信所，1981年第31版），頁188；池ノ上宏信件。

¹⁷⁰ 1950年代初期，陳奇祿（時任教臺灣大學）赴美國新墨西哥大學進修，在回國的船上認識一名日本教授，這位日本教授的友人來接船，此人即池田幸光。池田邀陳到家裡居住，池田的母親告訴陳：先生曾擔任總督府專賣局局長。後來陳奇祿曾為池田幸光轉信給臺北延平中學的校長朱昭陽兄弟。這段故事未被寫入口述訪談中，係訪談錄執筆者在後記中加以補述。參見陳奇祿口述、陳怡真撰文，《澄懷觀道：陳奇祿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4），頁295。

¹⁷¹ 根據池ノ上宏信件可知，在臺灣出生的池田幸光，日後就讀東京第一高等學校，接著進入東京帝大經濟學部，畢業前被海軍召集，本來預定使用特攻潛水艦出擊，事未成而日本宣告戰敗；戰後初期領取美國提供的獎學金赴美留學1年，歸國後從東大畢業，成為每日新聞社（英文報）的記者，再轉任職於アラビア石油（Arabian Oil Company），辭職前當到專務，轉而從事非洲的礦產開採；2009年去世。

法人國民休暇村協會（1961年成立，今一般財團法人休暇村協會的前身）之常務理事，亦曾任千葉大學園藝學部教授（1967-1976），擁有豐富的實務經驗，是國立公園、觀光行政、環境保護、造園等方面知名的學者專家，曾獲得日本造園學會賞、勳三等旭日中綬章、環境保全功勞賞、日本造園學會上原敬二賞。¹⁷² 在同窗會方面，他曾參加附小的同學會「榕蔭會」所舉辦的活動，¹⁷³ 也參加臺北高校日籍校友回到日本後所組成的「蕉葉會」。¹⁷⁴ 蕉葉會定期舉辦新年會與總會，此外也有各屆或各班同學自行集會的活動，池ノ上容曾參加這類活動。例如他曾參加1967年1月假虎之門共濟會館舉辦的蕉葉會新年會，翌年5月他出席在同一地點舉辦的總會。又如1970年2月蕉葉會員為將赴德國擔任駐德大使的甲斐文比古，在皇居前 Palace Hotel 舉辦祝賀暨歡送會，池ノ上容也出席，為臺高同屆的甲斐送行；他也參加了1972年11月在澀谷舉辦的歡迎甲斐歸國的聚會。1974年底「中村輝夫」（日本名「スニヨン」，中文名「李光輝」）在印尼摩羅泰島被發現後，蕉葉會呼籲成員伸出援手，他為此捐了2千圓。再如1980年5月他參加同屆同學林田健男（1910-1991，本名林鼎乾，曾任教東京大學醫學部）就任杏林大學副校長的祝賀會。¹⁷⁵ 為有成就的昔日同窗喝采，與蕉葉會成員重溫情誼、互相砥礪，可以說是池ノ上容的樂事之一。

2003年蕉葉會為紀念臺北高校創立80週年，編輯出版《獅子頭山讚歌：自治と自由の鐘が鳴る》，收錄校友們的感想，但或許由於編輯體例之故，每人所寫

¹⁷² 熊谷洋一、油井正昭，〈池ノ上容氏に聞く〉，《造園雜誌》（東京）56:4（1993年3月），頁367-372；油井正昭，〈名譽會員 池ノ上容先生を偲ぶ〉，《ランドスケープ研究》（東京）67:1（2003年8月），頁88。

¹⁷³ 例如他參加1973年11月在東京赤坂舉辦的第十九回榕蔭會，適逢會長由第三屆校友井上一男（醫師）交棒給岸田實。翌年2月井上前會長去世；9月在東京中野舉辦的總會，他也出席。又，1977年第二十三回的榕蔭會，他與弟弟池ノ上章參加，是池ノ上章少數參加活動的例子。其他年度的參加情形則不贅述。參見〈第十九回榕蔭會開催〉，《臺灣協會報》第232號，1974年1月，第3版；〈榕蔭會總會〉，《臺灣協會報》第241號，1974年10月，第2版；〈榕蔭會總會〉，《臺灣協會報》第277號，1977年10月，第3版。

¹⁷⁴ 有關蕉葉會之詳細，參見王麒銘，〈戰後臺北高等學校「蕉葉會」之成立及其活動〉，《國史館館刊》70（2021年12月），頁135-180。

¹⁷⁵ 〈蕉葉會（新年互礼會）〉，《臺灣協會報》第149號，1967年2月，第2版；〈蕉葉會の總會〉，《臺灣協會報》第165號，1968年6月，第4版；〈甲斐駐獨大使 祝賀並びに歡送會開催〉，《臺灣協會報》第187號，1970年4月，第3版；〈甲斐文比古氏歸朝歡迎會〉，《臺灣協會報》第219號，1972年12月，第2版；〈中村輝夫さんえ〔へ〕の見舞金拠出者芳名〉，《臺灣協會報》第219號，1975年2月，第1版；〈林田健男氏杏林大學副學長就任祝賀會〉，《臺灣協會報》第309號，1980年6月，第2版。

只有短短半頁。池ノ上容回憶就讀高校7年期間，曾登新高山（今玉山）及遍遊大屯、七星等全島各地的群山，為將來從事國立公園相關的工作打下基礎。他撰寫此文時年約90歲，仍擔任國立公園協會名譽會長，而在其參與有關國立公園及自然保護的國際機構或組織中，臺灣的國家公園問題最令他有特別的感觸。蓋1930年代總督府已指定要設立國立公園，到了戰後政府制定「國家公園法」（1972年），¹⁷⁶ 據此成立國家公園並進行管理，1993年登載於聯合國的國立公園與保護地區的名單上。因為日本與臺灣沒有邦交，日方遂由國立公園協會作為窗口，雙方定期舉行會議。也因此故，戰後他曾來臺灣訪問3次。例如1985年1月，池ノ上容與久保幹雄（國立公園協會常務理事）應邀擔任國家公園短期顧問，實際走訪陽明山和墾丁國家公園等地，並在內政部營建署發表專題演講。¹⁷⁷ 在這篇短文的最後，他寫道：「狀況雖然困難，祈願有豐美的成長。」¹⁷⁸ 池ノ上容的這個願望，看起來是祝福臺灣的國家公園事業爾後能順利發展，但執筆時思緒回到幼年時期度過青春、中年時期因公訪問的臺灣，或許也可將該文解說為其內心深處對臺灣的祝福吧！池ノ上容於2003年4月去世，享壽92歲，是池ノ上兄弟中最長壽者。

池ノ上典或因距離東京遙遠，較不容易參加母校臺北高校同窗會蕉葉會的大型活動，但必要時也會出席。例如同屆畢業的劉闊才（1911-1993，時任立法院副院長）於斷交後的1973年6月訪日時，蕉葉會成員在東京舉辦歡迎會，池ノ上典出席了這次小規模的聚會（主賓共20人）。¹⁷⁹ 他比較常參與以臺高同屆畢業

¹⁷⁶ 1981年營建署成立，負責原屬民政司的國家公園業務。以1980年代而言，1984年臺灣設立第一個墾丁國家公園，翌年設立玉山和陽明山國家公園，1986年設立太魯閣國家公園。2021年現在臺灣國內共有9處國家公園。關於戰後臺灣的國家公園設置歷程，參見曾華壁，《戰後臺灣環境史：從毒油到國家公園》（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頁181-194。

¹⁷⁷ 〈日籍專家昨天指出 臺灣國家公園兩種類型 慎重制訂經營管理政策〉，《民生報》，1985年1月27日，第4版；〈六十年後重遊墾丁陽明山 池上容訝異發展太快了 對我國家公園觀感 鼓勵多於苛責〉，《民生報》，1985年1月30日，第4版。此外，臺灣相關單位派員赴日考察時，例如1986年6月胡俊雄（內政部營建署主任秘書）、林義野（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課長）及劉川（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技士），曾前往日本國立公園協會拜訪，由時任副會長的池ノ上容接待。參見胡俊雄、林義野、劉川，《赴日本考察野鳥園設施暨國家公園建設報告》（無出版項，1987），頁3。

¹⁷⁸ 池ノ上容，〈台湾の国家（立）公園〉，收於山口房雄編，《獅子頭山讚歌：自治と自由の鐘が鳴る》（東京：旧制臺北高等學校記念文集刊行委員会，2003），頁190。

¹⁷⁹ 〈劉潤才先生歡迎會〉，《臺灣協會報》第226號，1973年7月，第3版。

生為主的「昭七會」(昭和7年畢業之意)。¹⁸⁰ 而在訪問臺灣方面，池ノ上典也曾來過臺灣從事技術指導。例如1958年1月，當時擔任黑崎窯業株式會社取締役的他，曾出差臺灣進行耐火物技術指導。¹⁸¹ 又如1972年8月，與黑崎窯業有技術合作關係的大華企業公司舉辦耐火磚用戶技術研討會，地點在國賓大飯店，池ノ上典發表專題演講；與會者有臺灣的鋼鐵、水泥、玻璃等業界代表約百餘人。¹⁸² 他長年在黑崎窯業任職，戰後歷任研究部長、研究所長、取締役、常務、東京支社長、專務、常任顧問等職。¹⁸³ 其專業研究的成果數度獲得肯定，曾獲恩賜發明賞(1959年)等，在日本由臺灣關係者所辦的報紙還對此事加以報導，並訪問池ノ上典。¹⁸⁴ 1969年他獲頒紫綬褒章；1984年12月去世。¹⁸⁵

池ノ上章於1937年從大學畢業後，擔任海軍軍醫長達10年，轉戰華北、華中、華南、馬來方面等地，終戰時的軍階是海軍少佐(即少校)；1947年起在長崎的國立川棚病院外科任職(該院前身是戰爭末期設立的川棚海軍共濟病院，戰後初期歸厚生省所管)，旋遭到「公職追放」(公職解除，為占領軍對日本中央與地方公職、經濟界及言論界等禁止其從事政治活動的措施)，於是開業行醫。¹⁸⁶ 他長期在長崎開業，與臺灣的關係一樣是透過同窗會與訪臺而維繫著。在同窗會

¹⁸⁰ 例如1967年10月他參加在東京中野某料亭舉辦的同屆畢業生聚會，1973年8月偕夫人參加在岐阜縣舉辦的同期生聚會，1975年8月在別府舉辦的聚會則由他與九州地區的同學費時半年籌備，1981年9月偕夫人參加在伊豆半島南端的國民休暇村舉辦的同期生聚會。參見〈卒業してから三十五年〉，《臺灣協會報》第158號，1967年11月，第4版；〈蕉葉會 昭七會開催〉，《臺灣協會報》第229號，1973年10月，第5版；〈台北高校昭七會〉，《臺灣協會報》第254號，1975年11月，第4版；〈蕉葉會・昭七會〉，《臺灣協會報》第325號，1981年10月，第3版。

¹⁸¹ ゆまに書房編集部編，《産業別「会社年表」総覧 第12巻：窯業・土石製品製造業》(東京：ゆまに書房，2000)，頁650。

¹⁸² 〈大華企業續辦耐火磚研討會 介紹鹽基性磚 池上講解特性〉，《經濟日報》，1972年8月11日，第6版。

¹⁸³ 〈恩賜發明賞にきまった池ノ上典〉，《朝日新聞》，1959年3月30日，第3版。

¹⁸⁴ 恩賜發明賞以外，1964年獲日本金屬學會谷川・ハリス賞(與八幡製鐵的大庭宏、黑崎窯業的宮武和海共同獲得)，1968年獲窯業協會賞，1975年獲耐火物技術協會賞的功勞賞。補充一提的是，其兄池ノ上容於1953年獲日本造園學會賞(論文調查部門)。參見日外アソシエーツ株式會社編，《科学賞事典》(東京：該社，1986)，頁297、339、570、702、941；〈二世が恩賜發明賞〉，《愛光新聞》第56號，1959年5月，第3版。

¹⁸⁵ 武內甲子雄編，《人事興信錄》，上卷，頁188；日外アソシエーツ株式會社編，《ジャパン Who was Who：物故者事典1983-1987》(東京：該社，1988)，頁41。

¹⁸⁶ 池ノ上宏，《台湾における日本統治の私的探求》，頁29；〈卒後50年の記念品を拝受して〉，《南溟會報》(東京)71(1987年9月)，頁11。

方面，臺北醫專與臺北帝大附屬醫專的校友組成「南溟會」，戰後自1950年6月開始發行會報，從中可見他繳納會費，也曾與會員捐款慰問健康惡化的堀內次雄（1873-1955，前醫專校長），贈與羽毛棉被1只與1萬圓。¹⁸⁷此外，與池ノ上章同屆的日本人醫專生組成「丑醫會」（因畢業的1937年之干支為丁丑），該會於戰前即成立，戰後恢復活動後，約一年舉辦一次旅行，並歡迎攜眷參加。到了1977年，他們為紀念畢業40週年，於是計畫訪臺與同屆畢業的臺灣人進行交流（該屆臺灣人於畢業前組成「綠杏會」）。日本方面負責訪臺事宜的是奴田原正一，臺灣方面則由董大成（1916-2008，時任臺灣大學醫學院教授）負責聯絡等準備事宜。池ノ上章夫婦也參加了這次訪臺旅行。¹⁸⁸長年從事醫療工作的他，於1999年1月去世。而假如其雙胞胎兄弟池ノ上和未戰死於中國，¹⁸⁹戰後他應該與同學們一樣，或在大學任教，或在研究單位、公司任職。¹⁹⁰

此外，池ノ上嘉的長女節子則透過體育活動，與臺灣有所交流，值得一述。愛好籃球運動的臺灣關係者，戰後在日本成立「臺灣箏友會」（箏球亦可寫作籠球，即籃球）。節子過去在臺灣時打籃球，戰後她曾參加臺灣箏友會相關活動。該會第一到第四回的大會在東京舉辦，1982年在大阪舉行第五回大會，來自全國的參加者近70名，包括節子等一高女的16人。1989年的第九回大會首度移師臺北舉行，為籌備這項跨國活動，日本方面有4位負責人，其中一位即是節子。¹⁹¹

限於篇幅與能力，本文無法全面描述池ノ上家第二代與臺灣的關係，但由上

¹⁸⁷ 〈堀內先生病氣御見舞〉，《南溟會報》10（1955年6月），頁36-37。這次捐款者共有30人，金額少則百圓，多則千圓（8人）；池ノ上章捐了1千圓。堀內於1955年5月去世，享壽82歲。

¹⁸⁸ 一行於1977年11月20至23日訪臺，參加者共27人，前兩天分別從日本各地飛往臺灣集合；先到烏來觀光，之後的行程主要包括：受昔日恩師杜聰明招待晚宴，訪問母校與醫院，參觀故宮博物院、私立臺北醫學院（創辦人胡水旺為醫專同屆校友），受臺灣校友招待晚宴，搭機前往花蓮及太魯閣觀光（當日來回），以晚宴回請臺灣校友等。參見〈皇后四十周年記念 同期生總會の為の訪台紀行〉，《南溟會報》52（1978年3月），頁11-13。

¹⁸⁹ 池ノ上和在臺北帝大農藝化學科的同學有6人，另一位戰死者也是臺北高校畢業的本間正三。本間在臺北帝大擔任講師，1943年1月入伍，8月戰死於緬甸，與池ノ上和戰死的時間接近。參見〈壯烈ビルマに戦死〉，《臺灣日日新報》，1943年9月29日，第3版。

¹⁹⁰ 池ノ上和的大學同學是：顏滄濤（任教臺大）、松尾英俊（農林省農業技術研究所）、李龍修（中臺橡膠公司）、林秉漆（臺灣油脂公司）、白木善三郎（高砂香料工業株式會社）。參見藤岡保夫編，《臺大同窗會會員名簿》（廣島：藤岡保夫，1961），頁28。

¹⁹¹ 〈台灣箏友會第五回大會〉，《臺灣協會報》第341號，1983年2月，第3版；〈第九回台灣箏友會大會〉，《臺灣協會報》第426號，1990年3月，第3版。

述內容可知，戰後在臺日本人懷著沉重與不安的心情踏上返鄉之路，池ノ上家的第二代日後憑藉著早年父母的苦心栽培，以及自身的努力而能立足日本，在各領域有出色的成績，同時透過參加相關活動，藉以維繫臺灣記憶，並與臺灣關係者間聯絡情誼，可以說他／她們的臺灣記憶不僅是基於戰前多年的臺灣經驗，到了戰後也不斷增添新的元素，不是只有回味往事而已。

五、結論

在近代日本與海外的關係史上，臺灣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為臺灣不僅是日本統治殖民地的開始，也吸引日本人南進新領土。前往臺灣即是本文主角池ノ上嘉人生的轉捩點。原本從事郵政工作的他，因長輩與總督府專賣局的關係，於 1912 年來臺任職專賣局；雖然日後未能在公務體系有所發展，但其能力獲得上司等人肯定，貴人青睞更是他轉職的契機。他把握機遇，逐步在保險業界出人頭地，當到大成火災的取締役，至 1939 年辭職；其一生在臺灣的時間比在日本內地還久，臺灣歲月中又有過半為大成火災打拼事業版圖。持平而言，固然善盡職分是他提升社會地位的主因，但不可忽略會社出資者益子逞輔的提攜，以及板橋林家林熊光的支持和器重也是重要的一股力量。

池ノ上嘉從公家機關轉入民間會社任職，得以擁有較佳的經濟力，能夠安居樂業，並讓子女多人都接受良好的教育。池ノ上嘉本身因為接受中等教育及專門的教育，而有較為寬廣的出路，自然會重視子女的教育；加以 1920 年代臺灣在內地延長主義之下，高等教育機關陸續成立，日本人子弟在臺灣也可以完成大學學業，有志者亦能赴日本內地求學。池ノ上嘉夫婦栽培 6 名子女接受完整的教育，第二代的男性皆取得帝大或工業大學的學歷，沒有人就讀高等商業學校或商科大學，間接可見池ノ上夫婦的心願是高學歷菁英家庭，衡諸當時在臺日本人子弟的教育水準，可以說達成一般家庭難以企及的目標。

1937 年日本與中國爆發戰爭後，戰爭漸次帶來嚴酷的考驗，在身、心、命三方面造成無數家庭陷入苦境，付出慘重的損失作為代價，池ノ上家亦不例外。到了 1945 年日本戰敗，臺灣被新的外來政權接收統治，緊接而來的是日本人被強

制遣返。池ノ上嘉失去其半生在臺所得資產，權益受損，遭受重大的打擊。1946年他與家人好不容易返回故鄉，卻面臨居住及糧食等嚴厲的現實問題，在困厄中去世，享壽64歲。雖然他無法頤養天年，或許足堪安慰的是，長男池ノ上容後來成為國立公園行政等方面的權威，次男池ノ上典在黑崎窯業逐次晉升，四子池ノ上章長年在長崎開業行醫，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發揮專長，有所成就，繼續栽培下一代。而隨著戰後日本逐漸穩定，池ノ上家第二代與日本的臺灣關係者之間，或透過同窗會等方式維繫情誼，或受邀訪臺，與臺灣有著深厚的感情。

家族史研究的可貴之處，在於書寫一人而及於數人，同時也具備書寫一家而及於數家的特性，能反映時代乃至跨時代的變遷及其特色；即使研究者關注的對象並非顯赫之家，在史學研究上所能帶來的貢獻，卻不一定渺小。從本個案可知，研究在臺日本人的家族史及其臺灣經驗，必須探討渡臺的時代背景、家庭經濟情況、子女教育歷程、戰爭擴大的影響等；此外，與內地親族之間的關係，以及戰後與臺灣之間斷而後續、隱而後顯的關係等，也是值得留意的視角。雖然與池ノ上嘉有關的文獻數量不多，但他所留下的資料使得其孫池ノ上宏能訴說家族歷史，為臺灣史研究中尚待拓展的領域提供寶貴事例。與池ノ上嘉家族一樣，第一代來臺，第二代在臺成長，1940年前後第三代誕生的在臺日本人家族，可謂所在多有，值得繼續深究。

引用書目

- 《人民導報》
《民生報》
《官報》
《府報》
《南溟會報》
《南溟會會報》
《琉球教育》
《高雄新報》
《國立公園》
《朝日新聞》
《愛光新聞》
《經濟日報》
《臺灣之產業組合》
《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日日寫真畫報》
《臺灣協會報》
《臺灣實業界》
〈永井家、隈元家、園田家、池ノ上家、岩崎家關係図〉（池ノ上宏提供）。
〈池ノ上嘉備忘錄〉（池ノ上宏提供）。
《海軍省公文備考》，檔號：C05035339800。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池田幸甚文書》，識別號：IKE_02。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0198010、00000343056、00000452019、00000571022、00000725001、00000874025、00001094016、00001124041、00001133031、00001273016、00001372001、00001601016、00001885025、00001894029、00002065053、00002197067、00002200035、00002311018、00002315008、00002888064X002、00002895085、00003010013、00003267012、00003462014X001、00003762002、00004323012、00004332124、00004335028、00004352003、00004352016、00005264012、00009262040、00009392059、00009398036、00009401080、00010215020、00010240007、00010252053、00010329002、00112475063、00112577003、00112610028。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典藏號：00101339006、00112439021、00112503091、00112592023。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臺灣鹽業》，典藏號：006-340002-013。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池ノ上宏先生致筆者電子郵件，2021年6月、10月。
津田勤子訪問、記錄，〈池ノ上宏（いけのうえ ひろむ）氏聞き取り〉（未刊稿），2019年6月21日於臺北市天津飯店。

- 胡俊雄、林義野、劉川，《赴日本考察野鳥園設施暨國家公園建設報告》（1987）。
- 〈1923年2月 沖繩県立第一中学校同窓会『同窓会報 第一号』①〉，「琉文」，下載日期：2021年6月4日，網址：<http://ryubun21.net/index.php?itemid=5681>。
- 〈1923年2月 沖繩県立第一中学校同窓会『同窓会報 第一号』②〉，「琉文」，下載日期：2021年6月4日，網址：<http://ryubun21.net/index.php?itemid=5936>。
-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網址：<https://www.jacar.go.jp/>。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網址：<http://tais.ith.sinica.edu.tw>。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網址：<https://who.ith.sinica.edu.tw/>。
- 「臺灣人物誌」資料庫，下載日期：2020年10月1日，網址：<http://tbmc.ncl.edu.tw:8080/whos2app/start.htm>。
- ゆまに書房編集部（編）
- 2000 《産業別「会社年表」総覧 第12巻：窯業・土石製品製造業》。東京：ゆまに書房。
- 又吉盛清
- 2018 《大日本帝国植民地下の琉球沖繩と台湾：これからの東アジアを平和的に生きる道》。東京：同時代社。
- 上原勇作関係文書研究会（編）
- 1976 《上原勇作関係文書》。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 丸山芳登（編）
- 1957 《日本領時代に遣した台湾の医事衛生業績》。横浜：丸山芳登。
- 千草黙仙（編）
- 1937-1943 《會社銀行商工業者名鑑》。臺北：圖南協會，第6-12版。
- 千種康允
- 1939 《臺灣縱横觀》。東京：經濟市場社。
- 大磯友明（編）
- 1939 《三州人會誌》。臺北：醫專三州人會。
- 小園江隆哉
- 1942 《回顧六十年》。臺北：小園江隆哉。
- 山口房雄（編）
- 2003 《獅子頭山讚歌：自治と自由の鐘が鳴る》。東京：旧制臺北高等學校記念文集刊行委員会。
- 山地清（編）
- 1941 《會員名簿》。臺北：臺高同窓會。
- 中西利八（編）
- 1934 《財界二千五百人集》。東京：財界二千五百人集編纂部。
- 内藤素生（編纂）
- 1922 《南國之人士》。臺北：臺灣人物社。
- 太田肥洲（編）
- 1940 《新臺灣を支配する人物と産業史》。臺北：臺灣評論社。
- 日外アソシエーツ株式会社（編）
- 1986 《科学賞事典》。東京：日外アソシエーツ株式会社。

- 1988 《ジャパン Who was Who：物故者事典 1983-1987》。東京：日外アソシエーツ株式会社。
日本歴史学会（編）
- 1999 《日本史研究者辞典》。東京：吉川弘文館。
王御風、吳孟青、杉森藍、許聖迪、黃于津
- 2017 《和風吹撫的港市：打造高雄日人的故事》。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我已文創有限公司。
王麒銘
- 2021 〈戰後臺北高等學校「蕉葉會」之成立及其活動〉，《國史館館刊》（臺北）70: 135-180。
王麗蕉
- 2020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在人文研究之應用：以日治臺灣初等學校教師及其跨境為中心〉，《臺灣史研究》（臺北）27(3): 167-212。
加藤聖文（監修・編集）
- 2002 《海外引揚關係史料集成（国内篇 第5、11卷）》。東京：ゆまに書房。
台北第一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同窓会榕蔭会（編）
- 1990 《台湾台北第一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の沿革（年表）》。東京：大儀幸雄公認會計士事務所。
1998 《榕蔭会會員名簿》。藤沢：台北第一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同窓会・榕蔭会，第11版。
台北第一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第十一期生
- 1970 《吾校》。東京：岸田實。
台湾台北州立台北第一中學校同窓会
- 1991 《麗正会名簿》。東京：台湾台北州立台北第一中學校同窓会。
平井二郎（編）
- 1940 《名嘉山安忠歌集》。臺北：あらたま發行所。
田中美帆
- 2021 〈移動與境界：臺北高校生・入管官僚竹内昭太郎の記憶分析〉。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田邊市教育委員會（編）
- 1996 《引揚港田辺：海外引揚五十年》。田邊：田邊市。
吉岡英一
- 1987 《断片集》。東京：金融財政事情研究会。
向山寛夫
- 1991 《向山寛夫自伝：我あり人あり喜寿を迎えて》。東京：中央經濟研究所。
成瀬麟、土屋周太郎（編）
- 1913 《大日本人物誌》。東京：八紘社。
朱德蘭
- 2016 《臺灣沖繩交流史論集》。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朱耀源
- 2009 《漢堡・米漿・味噌湯：我的人生故事》。臺北：華漾出版社。
池ノ上不鳴
- 1939 〈名嘉山安忠君の追憶〉，《あらたま》（臺北）18(9): 22-24。

池ノ上宏

- 2019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統治の私的探求：「植民地台湾」に命を削った二人の祖父》。埼玉：池ノ上宏。

池ノ上宏、徳田順作

- 2022 《日本統治下の台湾に渡った今和泉村の村びと》。埼玉：池ノ上宏；指宿：徳田順作。

池ノ上和

- 1943 〈水牛肉蛋白質の營養化學的研究〉，《熱帶農學會誌》（臺北）15(3): 70-77。

何鳳嬌（編）

- 1990 《政府接收臺灣史料彙編（下冊）》。臺北：國史館。

吳文星

- 2005 〈戰後初年在臺日本人留用政策初探〉，《臺灣師大歷史學報》（臺北）33: 269-285。

吳佩珍

- 2013 《真杉靜枝與殖民地臺灣》。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吳玲青

- 2021 〈殖民地臺灣熱帶園藝的地方實踐：增澤深治與二水「萬樹園」〉，收於闕正宗編著，《佛教、歷史、留學：交流視角下的近代東亞和日本——柴田教授退休紀念文集》，頁 383-397。新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我部政男

- 1979 《明治国家と沖縄》。東京：三一書房。

我部政男、宮城保（編）

- 1987 《明治・大正・昭和沖縄縣學校寫真帖》。沖縄：那覇出版社。

村山勇（編）

- 1937 《卒業生名簿》。臺北：臺北州立第一中學校麗正會。

- 1939 《會員名簿》。臺北：臺北州立臺北第一中學校麗正會。

沖縄大百科事典刊行事務局（編）

- 1983 《沖縄大百科事典（上卷）》。那覇：沖縄タイムス社。

谷サカヨ

- 1943 《大衆人事録：外地、満・支、海外篇》。東京：帝國秘密探偵社，第 14 版。

谷元二（編）

- 1940 《大衆人事録》。東京：帝國秘密探偵社，第 13 版。

周婉窈

- 1997 〈美與死：日本領臺末期的戰爭語言〉，收於黃富三、古偉瀛、蔡采秀主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頁 85-99。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東京工業大學（編）

- 1942 《東京工業大學卒業生名簿》。東京：東京工業大學。

東京郵便電信學校（編）

- 1893 《東京郵便電信學校一覽》。東京：東京郵便電信學校。

- 1903 《東京郵便電信學校一覽》。東京：東京郵便電信學校。

東恩納寬惇

1993 《東恩納寬惇全集3》。東京：第一書房，再版。

松田ヒロ子

2021 《沖繩の植民地的近代：台湾へ渡った人びとの帝国主義的キャリア》。京都：世界思想社。

林彥卿

2002 《非情山地》。臺北：林彥卿。

林祐里

2019 〈「灣生」川平朝清與其家族探討：臺灣、琉球與日本的邂逅〉。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

2004 《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

2004 《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

2004 《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九三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

2006 《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三九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

武內甲子雄（編）

1981 《人事興信錄》，上卷。東京：人事興信所，第31版。

河原功（解題）

2011 《台湾引揚者關係資料集（第1卷）》。東京：不二出版。

油井正昭

2003 〈名譽會員 池ノ上容先生を偲ぶ〉，《ランドスケープ研究》（東京）67(1): 88。

長里清（編）

1940 《九州文化大觀》。東京：日本文化研究會。

泉風浪

1932 《人と閩》。臺北：南瀛新報社。

津田勤子

2021 〈日治時期臺北市大正町日人居民及其空間記憶〉，《臺北文獻（直字）》（臺北）216: 155-194。

洪郁如

2014 〈戰爭記憶與殖民地經驗：開原綠的臺灣日記〉，《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臺北）24: 47-83。

2021 《誰の日本時代：ジェンダー・階層・帝国の台湾史》。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

范燕秋

2017 〈日治時期臺灣公共衛生與飲食營養：以營養缺乏症「腳氣病」為中心〉，收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整理組編輯，《第九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401-432。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首里高校創立百周年記念事業期成会（編）

1980 《養秀百年》。那霸：創立百周年記念事業期成会。

原口邦紘

2010 〈移民研究と史料：鹿児島県の場合〉，《JICA 横浜海外移住資料館研究紀要》（横浜）4: 39-52。

徐聖凱

2012 《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新北：Airiti Press。

堀口昌雄（編）

1925 《南洋協會十年史》。東京：南洋協會。

張炎憲、胡慧玲、曾秋美（採訪記錄）

2000 《臺灣獨立運動的先聲：臺灣共和國（上冊）》。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張素玢

2019 〈獵島行動：西太平洋島嶼的鳥糞採礦與國際勢力的角逐〉，收於《近代臺灣與東南亞》論文集編輯出版委員會主編，《近代臺灣與東南亞》，頁185-215。新北：國立臺灣圖書館。

淺野良（編）

1943 《會員氏名錄》。東京：學士會。

許雪姬

1995 〈臺灣家族史研究及史料〉，收於張炎憲、陳美蓉、黎中光編，《臺灣史與臺灣史料（二）》，頁211-240。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連克

2017 《從代理人到保險公司：臺灣商人的產物保險經營1862-1947》。臺北：國史館、政大出版社。

連克、曾耀鋒

2016 〈經營理念與派別之爭：日治時期大成火災海上保險株式會社經營始末〉，《臺灣史研究》（臺北）23(3): 43-84。

郭婷玉

2021 〈日常與監控：1910年代前期日籍警察與臺灣地方社會〉，《國史館館刊》（臺北）68: 43-94。

陳玉箴

2020 《「台灣菜」的文化史：食物消費中的國家體現》。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奇祿（口述）、陳怡真（撰文）

2004 《澄懷觀道：陳奇祿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

陳凱雯

2021 《港口、政策與人群移動：觀看近代臺灣史的微視角》。新北：采薈軒文創美學有限公司。

陳錦標

1999 《陳錦標回憶錄》。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

陳櫻桃、鄭志祥、鄭鳳綿（主編）

2005 《酷樣年代 風華再起：臺北市南門國小百週年慶特刊》。臺北：臺北市中正區南門國民小學。

鹿兒島市（編）

1955 《鹿兒島のおいたち》。鹿兒島：鹿兒島市。

鹿兒島県（編）

1980 《鹿兒島県史》，第5卷下。鹿兒島：鹿兒島県。

曾華璧

2011 《戰後臺灣環境史：從毒油到國家公園》。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湯熙勇

- 2021 〈日本臺灣總督府經營南海諸島的歷程及其意涵（1907-1945）〉，收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輯組編，《第11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47-366。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菅野尚夫（編）

- 1941 《會員名簿》。臺北：南溟會。

華樂瑞（Watt, Lori）（著）、黃煜文（譯）

- 2018 《當帝國回到家：戰後日本的遣返與重整》。新北：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黑羽夏彥

- 2018 〈日治初期日本基督教徒在臺活動與人際關係之研究：秋山善一、秋山珩三兄弟為中心〉。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葉碧苓

- 2020 《全方位的文化人：尾崎秀真（1874-1949）研究》。臺北：蕙風堂筆墨有限公司出版部。

詹雅晴

- 2019 〈帝國邊陲的沖繩家族：南風原一家的移動與其時代〉。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鈴木清幹（編）

- 1941 《蒙疆年鑑》。張家口：蒙疆新聞社。

榕蔭会昭和2年卒業第14期生会（編）

- 1979 《あひるの行列：台北第一師範学校附属小学校卒業五〇周年記念文集》。東京：榕蔭会昭和2年卒業第14期生会。

熊谷洋一、油井正昭

- 1993 〈池ノ上容氏に聞く〉，《造園雜誌》（東京）56(4): 367-372。

福田廣次（編）

- 1926 《臺灣商店日三州名刊錄》。臺北：臺灣薩隅日三州所。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百周年紀念專輯編輯委員會（總策畫）

- 2014 《揮百年風華 灑世紀璀璨》。臺北：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臺北州立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編）

- 1929 《臺北州立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要覽》。臺北：臺北州立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

臺灣總督府（編）

- 1913-1923 《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與儀清

- 1932 《臺灣の寶庫と沖繩縣》。那霸：與儀清。

趙祐志

- 2013 《日人在臺企業菁英的社會網絡（1895-1945）》。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横井香織

- 2018 《帝国日本のアジア認識：統治下台湾における調査と人材育成》。東京：岩田書院。

歐素瑛

- 2003 〈戰後初期在臺日人之遣返〉，《國史館學術集刊》（臺北）3: 201-227。

蔡蕙頻

- 2021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統治の私的探求：「植民地台湾」に命を削った二人の祖父》書介〉，《臺灣史料研究》（臺北）57: 163-166。

蔡錦堂

- 1994 《日本帝國主義下台湾の宗教政策》。東京：同成社。
2017 〈新竹中學校出身的臺北高等學校生初探〉，《師大臺灣史學報》（臺北）10: 123-150。

鄧慧恩

- 2019 〈木村家族與日治時期臺灣北部的盲啞教育〉，《臺灣風物》（臺北）69(1): 13-63。

橋本白水

- 1930 《臺灣統治と其功勞者》。臺北：南國出版協會。

戴維理 (Dawley, Evan) (著)、堯嘉寧 (譯)

- 2021 《成為臺灣人：殖民城市基隆下的民族形成 (1880s-1950s)》。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鍾淑敏

- 2010 〈殖民地官僚試論：以池田幸甚為例〉，《臺灣學研究》（新北）10: 25-44。

顏杏如

- 2013 〈與帝國的腳步俱進：高橋鏡子的跨界、外地經驗與國家意識〉，《臺大歷史學報》（臺北）52: 251-302。

顏杏如

- 2020 〈在台日本人：日本帝國下の人口移動と文化変容〉，收於若林正丈、家永真幸編，《台湾研究入門》，頁 61-73。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瀨辺惠鍬

- 1970 〈戦没した三人の同僚〉，收於蕉葉會編，《台北高等學校：1922年-1946年》，頁 256-261。東京：蕉葉會。

藤岡保夫 (編)

- 1961 《臺大同窗會會員名簿》。廣島：藤岡保夫。

關猪之助 (編纂)

- 1933 《高雄州下鹿兒島縣人芳名錄》。高雄：鹿兒島縣人芳名錄發行事務所。

Experiences of Japanese Families in Taiwan: Case Study of Ikenoue Kuwae Family

Chi-ming Wang

ABSTRACT

Migrants from Japan who moved to Taiwan during early Japanese colonization or came to seek opportunities under more stable colonial rule might have offspring born or grown up in Taiwan. Those who remained until Japan surrendered in 1945, ending World War II (WWII), would have three to four decades of experiences in Taiwan. This study traces the history of the Ikenoue Kuwae family as an example.

Ikenoue Kuwae (1883-1946) moved to Taiwan in 1912 and held a position in the Taiwan Governor General Monopoly Bureau. After resigning in 1920, he worked at Taisei Fire and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In 1940, he joined the Kaiyokogyo Company.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changes in his job description from a public officer to a private company employee, with focus on his personal connections and financial strength. Among the four sons and two daughters of the second-generation Ikenoue family, five were born in Taiwan. They all received higher education, which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ir future development. By detailing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the second-generation Ikenoue family,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Taiwan's education history. Furthermore, the history of the Ikenoue family during the war and after their return to Japan to rebuild their lives after WWII can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during and after WWII.

Keywords: Ikenoue kuwae, Taiwan Governor General Monopoly Bureau, Taisei Fire and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Taihoku Higher School